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23期（民國113年3月），1-4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溫泉療養、公共洗浴與景觀重建：以驪山華清池為例*

黃　菲**

摘　要

與歐美日及其殖民地區的溫泉或礦泉療養的豐富研究成果相比，對中國溫泉的研究則相當匱乏。本文以西安城郊風景區的驪山華清池為個案，探討中國近代溫泉療養、公共洗浴與城郊景觀重建的歷史。華清池經歷了從中古以來的皇家名勝到晚唐之後的荒廢，進而在宋元明清至民國時期得到重新維護、修建和開發的過程。1932 年國民黨政府一度開啓西京計畫遷都西安，並在西安城郊建立風景區、古蹟保護區，同時推動公共衛生與旅遊開發。近代商業化的溫泉療養和公共浴場的新興理念已成為北京、南京等城市上層社會菁英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位於西京風景區的華清池被重建為服務上層階級的休養之所，同時也經過民間資本的商品化與官方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改造，成為外來遊客的溫泉浴場。此外，明清時期本地社區中下階層居民對此溫泉所形成的共同使用機制也並未完全消失。華清池的近代重建，關乎城郊自然環境的改造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私人身體的感官享受、治療與療養。本文將展現近代中國社會中各類群體如何認識、控制、管理、消費與想像華清池溫泉這處自然資源，從而揭示日常生活中的溫泉療養、公共洗浴與景觀重建之間相互連動發展的歷史過程。

關鍵詞：溫泉、療養院、公共洗浴、西京計畫、城市郊區景觀

---

* 筆者於 2017 年至 2019 年間曾四度前往陝西查閱地方檔案並進行田野調查，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爲筆者提供了短期訪問的職位。感謝侯勇堅、王社教、史紅帥、潘威、張莉、李鵬、楊博在西安的熱情接待和幫助。感謝陝西省檔案館、西安市檔案館、臨潼縣檔案館爲查閱檔案提供便利。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近史所集刊編輯們爲本文所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
收稿日期：2022 年 10 月 1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

** 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系教授

一、前　言

天然溫泉歷來是遍及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休旅勝地之一。自十八世紀下半葉由西歐開始的現代轉型中，包含溫泉在內的各類礦泉療養，迅速發展爲席捲全球的風潮。相關學者廣泛討論了礦泉療養度假勝地（spa/health resort/kurort）以及與此相關的各類療養院（sanatorium）的發展歷史。針對歐美不同地區的個案研究，尤其注重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休閒社交文化、水療法（hydropathy）、浴療法（balneotherapy）與正在形成的臨床醫學與實驗室醫學之間的衝突和調和，以及由現代國家主導的公共衛生與新興的旅遊開發、城市規劃、景觀設計，與之相關的文學、藝術創作等不同的交織面向。[1]此外，關於非歐美地區殖民地礦泉療養發展的相關研究，亦將其置於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反思的框架下，討論近代水療和社交休閒模式在殖民地的複製，與殖民地原住民或本地居民之間的衝突和互動，以及當地社會公共衛生與城市建設

[1] 關於歐美近代以來礦泉療養的論著頗豐，僅舉英文出版物數例如下：Jane M. Adams, *Healing with Water: English Spas and the Water Cure, 1840-196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Karl E. Wood, *Health and Hazard: Spa Culture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Susan C. Anderson and Bruce H. Tabb, eds., *Water, Leisure and Culture: Europ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2); Ian Bradley, *Water Music: Making Music in the Spas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David Blackbourn, "Fashionable Spa Towns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in Susan C. Anderson and Bruce H. Tabb, eds., *Water, Leisure and Culture: Europ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p. 9-22; Adam T. Rosenbaum, "Grounded Modernity in the Bavarian Alps: The Reichenhall Spa Cultur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1 (2014), pp. 30-53; Heikki Lempa, "The Spa: Emo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Classes in Nineteenth-Century Pyrmont,"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5:1 (2002), pp. 37-73; Alison F. Frank, "The Air Cure Town: Commodifying Mountain Air in Alpine Central Europe,"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5:2 (2012), pp. 185-207; Flurin Condrau, "'Who Is the Captain of All These Men of Death':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Tuberculosis Sanatorium in Postwar German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2:2 (2001), pp. 243- 262; Leslie Topp, "An Architecture for Modern Nerves: Josef Hoffmann's Purkersdorf Sanatorium,"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6:4 (1997), pp. 414-437; Marie C. Nelson and Staffan Förhammar, "Swedish Seaside Sanatori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 2:2 (2009), pp. 249-266.

的現代性發展。[2]總體而言，儘管世界各地的天然溫泉或礦泉開發和利用各有其在前現代時期的歷史脈絡，但自十八世紀中後期的西歐開始，礦泉療養模式逐漸在十九世紀的歐美及其殖民地進入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礦泉療養醫師（spa doctor）則力圖實現對各類礦泉規範性的醫療使用，與水療或療養地相關的基礎設施也逐漸在較為專業的礦泉療養地中出現。同時，礦泉亦由國家相關機構或私有資本投資對其進行經營管理，並全面進入商業化的大眾醫療、旅遊休閒、娛樂消費的領域。此外，礦泉療養被納入十九世紀末歐洲逐漸建立的醫療健保制度，也帶來了更為廣泛的療養受眾。礦泉療養地更是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成為士兵和傷兵療養的主要場所之一。至二十世紀中期，礦泉療養休旅成為世界各地普遍受到大眾歡迎和消費的全球現象，各地區在具體設施安排和經營管理上有其側重，亦保持因地而異的發展模式。

與歐美日及其殖民地區的溫泉或礦泉的豐富研究成果相比，對於中國溫泉的研究，無論是在帝制時代還是在近代發展階段都相當匱乏。[3]在中國，溫泉自帝制時代就已被大量運用於洗浴、藥用、灌溉等日常生活層面，並在諸多文人的描繪和想像下，成為重要的社會文化景觀。在帝制時代分散於各地的紀錄中，溫泉是唾手可得的天然之利，但也常由人工整治維修，或成為專供帝王及

2 例如 Eric T. Jennings, *Curing the Colonizers: Hydrotherapy, Climatology, and French Colonial Spas* (Duk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asey Walsh, *Virtuous Waters: Mineral Springs, Bathing, and Infrastructure in Mexico*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Ian Rockel, *Taking the Waters: Early Spas in New Zealand* (Well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Publications, 1986). 另外關於日本的溫泉研究或「溫泉學」也同樣蔚為大觀，限於篇幅本文無法一一列舉，可參考下文與此相關的討論。

3 僅有少數研究關注帝制時期的中國溫泉，諸如 Edward H. Schafer, "The Development of Bathing Custom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Floriate Clear Pala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6:2 (1956), pp. 57-82; 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溫泉〉，《〈水經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頁 78-87；龔勝生，〈中國宋代以前礦泉的地理分布及其開發利用〉，《自然科學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頁 343-352；何小芊，《中國溫泉旅遊的歷史地理研究》（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2013）。關於近代中國的避暑與海濱休旅，參見潘淑華，〈城市、避暑與海濱休旅：晚清至 1930 年代的北戴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5（2017 年 3 月），頁 39-75；António Eduardo Hawthorne Barrento, "Going Modern: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t the Seaside and Hill Resort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52:4 (2018), pp. 1089-1133.

貴族菁英的奢侈享用，或提供在地平民的日常之需。[4]二十世紀中國各地溫泉先後經歷了被重新改造爲浴場和療養所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本文所關注的中國近代溫泉公共洗浴與療養，不僅與近代城市公共空間和城郊自然環境的改造密切相關，也與不同社會階層私人身體的感官享受與疾病治療，以及由政府主導的公共衛生和民眾教育相關。藉由溫泉療養的多重社會文化面向，使得我們可以反思近代中國轉型中的私人身體與公共空間。而探尋近代中國溫泉療養中所體現出的前現代使用傳統與地方性知識和實踐，及其如何與源自歐洲的現代礦泉療養文化之間互動的歷史過程，就顯得尤爲關鍵。

不可否認，近代西方對於礦泉療養的認知與經營直接影響了近代中國溫泉的開發。不過，正如筆者在本文中所展示，與其追問來自近代西方礦泉洗浴療養風潮是如何被引進與複製，更需反思在中國溫泉開發中不同的參與者在日常消費與想像中，如何在不同的前現代或鄉土慣習與現代轉型觀念之間來回擺盪的過程。同時不可忽視的是，所謂「西方」主導的風潮本身也並非一成不變，十九至二十世紀之間在各自的歷史脈絡下也同樣經歷了新舊並存與轉變調整。因此，雖然本文聚焦於近代溫泉療養洗浴，但亦希望藉此進一步討論並呈現具體是哪一種「西方」風潮的橫斷面，在特定時期的中文語境下被理解和挪用，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現代中國的不同行動者對於身體與健康的認識，又在何種程度上與根植於本土的傳統實踐發生互相嫁接的過程。

此外，這一過程也與近代中國城市化興起中的城市規劃、公共衛生建設以及城市郊區休旅文化的發展密切關聯。相關討論大多集中在沿海口岸以及長江運河沿岸的城市。[5]本文以近代西安城郊風景區規劃和發展中的驪山華清池爲

4　筆者另文梳理了帝制時期儒家學者對溫泉的格物之辨、與溫泉相關的地理類紀錄與考訂、與療疾相關的醫方紀錄、以及與溫泉相關的明清時期中西交流與文人品鑒文化。參見：Fei Huang, "Knowledge Building on Nature and Body: Hot Springs in Premodern Chinese Sources. An Overview,"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57 (2023), pp. 47-80.

5　關於近代中國公共衛生建設與近代城市發展之間的探討，參見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Angela Ki-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個案，論述近代中國內陸城市中，城市菁英話語與大眾日常生活使用中的溫泉、公共洗浴、城郊景觀與環境改造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明清已降及近代的西安城市研究，遠不及上古與中古長安城的研究豐富。[6]隨著經濟和政治重心的東移，西安逐漸喪失帝國的中心地位。儘管如此，西安一直作爲代表中國古代文明高峰的標誌性文化符號，同時也具備西北腹地門戶的重要戰略地位。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入侵上海後，國民黨政府一度考慮將西安設爲陪都，並於同年成立西京籌備委員會。儘管國民黨政府在 1937 年 11 月正式宣布了將重慶作爲陪都的修訂計畫，但西安和西北已被重新引入公眾討論，成爲保護中國文化之根的重要地域，使得西安的城市建設並沒有因爲西京計畫的擱淺而停止。同時在戰時緊急情況下，東部地區的主要人力和物力等各種關鍵資源也急需轉移到廣大的西部腹地。在此背景下，建立西京和開發西北計畫極大地刺激了西安在 1930-1940 年代的城市建設和管理。

由於西安城郊以及整個關中地區的文物古蹟分布相當密集，西京計畫中最爲重要的建設內容之一就是建立城市風景區，其中就包括了重建華清池。作爲中國最著名的溫泉，華清池在無數的文學藝術作品中被不斷唱誦，但其在盛唐之後的現實發展歷程與實際運用的歷史卻幾乎無人問津。實際上，華清池經歷了從皇家名勝到盛唐之後的荒廢，進而在宋元、明清至民國時期被不同的地方群體重新維護、修建和開發的過程。華清池在近代被重建爲配備現代設備且兼具服務上層階級的休閒之所，同時也經由民間資本的商品化改造，成爲針對普通遊客的溫泉浴場，甚至在西安事變之後被地方政府重建爲民族復興的意識形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關於明清以降及近代西安城市發展的研究，主要參見史紅帥相關著作成果：《明清時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近代西方人視野中的西安城鄉景觀研究（1840-1949）》（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近代西方人在西安的活動及其影響研究（1840-1949）》（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Jeremy Tai, “Opening Up the Northwest: Reimagining Xi’a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Frontier”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2015); Pierre-Etienne Will, “Xi’an, 1900-1940: From Isolated Backwater to Resistance Center,” in Billy K. L. So and Madeleine Zelin, eds., *New Narratives of Urban Space in Republican Chinese Cities: Emerging Social, Legal, and Governance Orders* (Leiden: Brill, 2013), pp. 223-274.

態景觀。不過，明清時期地方社區中所形成的不同階層共同使用的機制並未完全消失，當地人對華清池的日常使用依然在地方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新興的旅行社、來自各方的中央與地方大員、普通遊客、醫師、地方駐軍將領與普通士兵、土匪、在地住戶與村民，以及在戰亂中湧入關中地區的難民等各個群體，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驪山華清池的重構並保有各自的療養洗浴體驗與景觀記憶。本文將論證，二十世紀重新建立的華清池，固然是現代全球盛行的溫泉洗浴療養文化下的在地發展，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前現代中國地方社會將溫泉作爲公共自然資源所形成的社會使用機制的「現代」延伸。由此，本文將通過分析民國檔案、報紙、遊記等材料，討論西安城郊風景區中華清池的重建歷史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公共衛生、民眾教育和民族主義建構以及城市日常休閒等議題，進一步揭示近代中國城市轉型過程中的溫泉療養、公共洗浴與城郊景觀重建之間相互連動發展的歷史過程。

二、在文化遺產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華清池

1903 年 2 月初，德國記者兼軍官 Erich von Salzmann（1876-1941）在他中國西北的旅途中到達臨潼，一個距西安東郊 26 公里的縣城。在這裡幫他指路的老人建議他進入西安之前，先去看看驪山的溫泉。當他來到位於縣城南郊的這處溫泉，見到的是在東西軸線上的兩進大院，他先是發現一群當地的「中產階級男子」（die mittleren Klassen der Bevölkerung männlichen Geschlechts）在第一進院子裡的男池洗浴，隨後他被看管此地的小吏引入第二進的「浴室衙門」（Bade-Yamen），內中建有專門供「上層階級」（oberen Zehntausend）使用的浴池和留宿的客房。他還注意到，在第二進院牆外的溫泉源頭處，建有一座寺觀，人們在被溫泉水治癒他們的疾病後，會去那裡再次祈禱並呈上他們寫在紅色紙條上的謝辭。在院外西側還有另一處「浴室衙門」，內中單獨建有女池。同時，在大院之外也有爲一般平民男性勞工（kuli）使用的池子，不過他們通常只是很快速地擦臉和洗腳。最後，他來到了第二進院子東側的園子，這裡專

供「皇室成員」（Angehörige des kaiserlichen Hauses）使用。在遊覽結束後，他被邀請在此洗浴，隨後又接受了美味的晚餐款待。餐後，他帶著相機從園子後面的小徑一路漫步上山，一邊享受山間風景，一邊眺望臨潼縣全城。Erich von Salzmann 心滿意足：「我必須說，我不記得有哪次洗澡能像這次在中國這樣愉快！」[7]

Erich von Salzmann 的敘述詳實直白，並記錄了當地對這處溫泉的使用細節和空間安排，但顯然他並不清楚這處溫泉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位於西安東郊臨潼的驪山佔地約 350 平方公里，最高峰爲 1,302 米，溫泉位於北山山腳處。驪山溫泉在至少不晚於漢代的紀錄中，就被廣泛用於公共沐浴和治療疾病。在《水經注》所記錄的傳說中，甚至奇蹟般地治癒了秦始皇帝的瘡病。[8]唐朝皇室對此處溫泉的修建和使用達到了頂峰。747 年由唐玄宗所重新設計並定名的華清宮，成爲他與愛妃楊玉環流連忘返之所。同時，他也在驪山北山麓上修建了數座廟宇宮觀。遊覽驪山溫泉亦是盛唐時期皇室成員、貴族、官員和文人最爲鍾意的休閒活動。[9]華清池因此在後世成爲最爲著名的歷史和文化遺蹟之一，被無數文人墨客唱頌，不斷追憶過去的盛世，惋惜不復存在的美人與美景。

---

7 Erich von Salzmann, *Im Sattel Durch Zentralasien: 6000 Kilometer in 176 Tagen*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908), p. 103.

8 〔東漢〕張衡著，〈溫泉賦〉，收入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5；〔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461。

9 沈睿文，《安祿山服散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258-281；〔唐〕徐堅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45；〔宋〕程大昌撰，黃永年點校，《雍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81-84；唐華清宮考古隊，〈唐華清宮湯池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文物》，1990 年第 5 期，頁 10-20；唐華清宮考古隊，〈唐華清宮湯池遺址第二期發掘簡報〉，《文物》，1991 年第 9 期，頁 1-14；趙康民，〈唐華清宮調查記〉，《考古與文物》，1983 年第 1 期，頁 32-38；張鐵寧，〈唐華清宮湯池遺址建築復原〉，《文物》，1995 年第 11 期，頁 61-71；葛承雍，〈唐華清宮沐浴湯池建築考述〉，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卷 2，頁 437-454。

關於華清池在盛唐之後至十九世紀末之間不斷被不同地方群體重修和再利用的歷史，筆者另有專文詳細闡述，在此不再贅述。[10]簡而言之，在安史之亂後，華清池就被朝廷視爲不吉之所，在晚唐時期，「驪宮圮毀，永絕修營，官曹盡復於田萊，殿宇半堙於巖谷」。[11]在五代與宋元金之間，不同時期的地方道教團體佔據此地，重修宮觀和浴池，維護溫泉浴池的日常運作以及管理其周邊的土地財產和自然資源。作爲西北地區的重要驛站之一，此處也建有溫泉行館爲過往士大夫官員提供停宿和洗浴。明代以降，重修之後的西安城成爲與西北邊地相連的重要據點，隨著地方政府的建制逐漸穩固，臨潼縣官員越來越多地參與驪山溫泉的日常管理與修繕。面對蜂擁而至的遊客與源源不絕的本地浴客，至少不晚於十五世紀下半葉（約明成化年間），驪山溫泉已有「官池」與「民池」之區隔：「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宦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爲男女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12]驪山溫泉在明清時期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重建發生在十九世紀末。在同治陝甘回變後，新任臨潼知縣沈家禎重建了華清池，內中設有官廳、廚房、馬廄和供行人住宿的房間。同時他還模仿江南園林的樣式，在此新建了「環園」，並在園中修建最高等級的浴池「貴妃香溏」與「淨塘」。環園的設計相當雅緻，是爲最尊貴的來客所備的洗浴與停宿之所。在帝制最後時期，慈禧太后在辛丑之亂後的西遷和 1901 年的北歸曾在此兩次駐蹕。[13]隨後，清廷被迫簽訂辛丑條約，而 Erich von Salzmann 正是在此之後來訪，記錄下他的觀察和體驗。

---

10 Fei Huang, “Bathing through Time and Landscape: Everyday Encounters and Reconstructions at Huaqing Hot Springs (1000-1900),” *T’oung Pao*, 109:3/4 (2023), pp. 308-351.

11 〔唐〕元稹，〈兩省供奉官諫駕幸溫湯狀〉，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冊 7，卷 651，頁 1a。

12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頁 4；〔明〕都穆，《游名山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驪山〉，頁 3-4。此處「混堂」是元代起對中下階層的公共商業浴室的稱呼，並非男女混浴之意。

13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卷 472，頁 4a；卷 486，頁 27b。

總體而言，盛唐之後歷代對華清溫泉重新修整和改造，對於華清宮的感懷與想像從未消退。不過，除了建構一處令城市文化菁英可以休閒與懷古的遊覽勝地之外，華清溫泉實質上在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香客的進香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個角色雖然不爲文人菁英所重視，但卻始終沒有在地方社會中消失。在明清時期，供當地一般男女沐浴的浴池一直作爲在地重要的公共沐浴場所與官池並存。此外，這類公共洗浴活動不僅是爲了清洗與放鬆，更與治癒各種疾病的民間信仰交織在一起。當地男女在洗浴或飲用所謂治百病的溫泉水後，在溫泉源頭虔誠祭祀，之後繼續前往驪山上的各處廟宇神靈朝拜。Erich von Salzmann 在二十世紀初所記錄的信眾還願之舉，正是明清以來地方信眾在溫泉源頭處祭祀朝拜傳統。地方社會中這種溫泉使用機制，反應出驪山當地不同階層與性別之間並存的多種沐浴活動，匯流成爲在地對溫泉日常公共使用持久不衰的傳統。正如筆者將在下文中所展現的，漫長的前現代時期形成的傳統使用慣例與管理機制，將在某種意義上延展至華清池的現代再造過程當中。

三、近代中國溫泉療養休旅與華清池重建

作爲自古以來對溫泉長期使用的現代延續，近代中國溫泉療養與公共洗浴亦是全球溫泉與礦泉療養發展的一部分。自十三世紀公共浴場逐漸恢復以來，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各地在日常使用中發展出對礦泉的分類調查與有序管理。[14]十九世紀之後專治礦泉水療的醫師開始採納當時的科學語言系統書寫和推廣礦泉治療，例如德國 Emil Osann（1787-1842）所著《歐洲主要國家著名

14 關於歐洲礦泉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發展概況，可參見 Richard Palmer, "'In This Our Lightye and Learned Tyme': Italian Baths in the Era of the Renaissance," *Medical History*, 34:10 (1990), pp. 14-22. Katharine Park, "Natural Particulars: Medical Epistemology, Practice, and the Literature of Healing Springs," in Anthony Grafton and Nancy Siraisi, eds., *Natural Particulars: Nature and the Disciplines in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pp. 347-368. 關於歐洲礦泉療養簡史，可參見 Astrid van Tubergen and Sjef van der Linden, "A Brief History of Spa Therapy," *Ann Rheum Dis,* 61:3 (2002), pp. 273-275.

療養泉的理療介紹》。[15]他們強調不僅需要對不同地區中的泉水進行物理性質和化學元素分析，每個專門的水療程序也需要在礦泉或水療醫師的指導下，精心設計每天飲用、淋浴、浸浴、以及蒸汽浴的具體使用步驟和相關劑量，以此來預防或治療皮膚病、各類結石病、神經衰弱和風濕病等慢性疾病。伴隨這些專門的治療方法和相應設備，是在理念上強調一種清潔有序並貼近自然的療養方式。因此療養地點往往選在鄉間、林間、高山或海邊這類空氣、水和環境都很優質的地區，同時結合定製飲食搭配和各種鍛鍊安排，以達到康復的效果。而在休養恢復身體中對於新鮮空氣與怡人自然環境的強調，也與此時盛行的海濱與高山度假休養地（seaside / hill resorts）的經營概念以及與此相關的氣候療法（climatotherapy）有所重疊。[16]

不過，在礦泉療養的實際發展當中，往往會與休閒洗浴結合成為度假會所。在這類休閒療養度假所中，除了提供上述各種水療和自然療法設施外，還會在附近修建療養公園（spa park）、森林公園、音樂廳、舞廳、講座廳、閱讀室、劇院、畫廊、賭場、馬場等各類場所，以供來訪者社交、遊玩、鍛鍊與盡情享受。同時在報紙和各類出版品中，以旅遊手冊、指南、廣告等形式，向大眾宣揚礦泉療養勝地。以歐洲而言，礦泉療養勝地的近代發展，也與當時對工業化的反思和焦慮有關。各地的礦泉療養地使中產階級城市居民可以短暫離開喧嘩嘈雜且汙染嚴重的工業化城市中心，回歸自然休養身心。隨著鐵路的普及，各地的療養地也相繼迎來了更多的外來訪客。同時這類療養與經營模式也在殖民地地區中擴散開來。各地的礦泉療養在具體經營管理中呈現出在水療醫

15 Emil Osann, *Physikalisch-medicinische Darstellung der bekannten Heilquellen der vorzeüglichsten Länder Europa's, II* (Berlin: Ferdinand Dümmler, 1832); Emil Osann, *Physikalisch-medicinische Darstellung der bekannten Heilquellen der vorzeüglichsten Länder Europa's, I* (Berlin: Ferdinand Dümmler, 1839). Osann 在第一卷中依照不同類型的泉水列舉了德國、瑞士、法國、義大利、英國的主要礦泉，並計劃之後分卷詳細展開。但他於 1842 年去世，因此只完成了第二卷專門針對德國的礦泉研究。

16 可參考註 1 中所提及歐洲海濱與山地療養的相關研究。

治與休閒社交遊玩之間此消彼長的張力。而這種模稜兩可的定位，亦成爲各地溫泉療養中各有經營重點的關鍵。[17]

近代西歐興起的礦泉療養經營理念與模式在二十世紀初進入中國，主要來自於早期進入中國的西方人、自海外留學與遊歷歸來的新興上層或知識階層，以及在報刊雜誌中對歐美日等地區溫泉療養的各類報導與見聞，而諸如廬山、北戴河、雞公山、莫干山等處也由在華西人重新規劃建設爲現代海濱與高山避暑勝地。很快地，新興的國民黨政府黨政軍要員與商業鉅子亦紛紛在各處避暑勝地興建度假別墅。[18]與此同時，近代溫泉洗浴療養的理念很快爲北京、上海和其他東部沿海城市新興上層社會階層與城市菁英所接納。其中，較早享譽全國的是位於北京郊區的湯山（今小湯山醫院）與南京郊區的南湯山。與許多中國其他地方的溫泉勝地一樣，他們的名字本身就已經表明了自帝制時期的長期使用情況。湯山在盛清時期曾作爲「湯泉行宮」，是皇室成員最愛前往的勝地之一，不過在晚清已被皇家廢棄。[19]民國年間的新興上層菁英開始在此建造別墅以便休閒療養，其中包括了袁世凱（1859-1916）與他因腿傷從德國療養歸國的兒子袁克定（1878-1958）。[20]1918 年，北京協和醫院分析了湯山溫泉的物理性質和化學元素。[21]自 1920 年代開始，湯山別業、湯山飯店也在此建成。

---

17 關於歐洲及其殖民地中礦泉療養地的近代轉型，參見註 1、2。

18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全面討論近代礦泉療養經營模式進入中國的具體過程。關於自十九世紀末歐洲人在遠東地區（從印度西部、中國到日本東部）創建的高山避暑和療養勝地的統計，參見 J. E. Spencer and W. L. Thomas, “The Hill Stations and Summer Resorts of the Orient,”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38:4 (1948), pp. 637-651. António Eduardo Hawthorne Barrento, “Going Modern,” *Modern Asian Studies*, 52:4, pp. 1089-1133. Spencer 與 Thomas 文中特別提及由傳教士在廬山的牯嶺鎮以及日本等地所建立的溫泉療養地。自歐美歸來的留學團體也在中國發掘並建設新的溫泉療養地，如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於 1920 年代北京西山碧雲寺成立的天然溫泉療養院。參看陳三井，《旅歐教育運動：民初融合世界學術的理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頁 91。民國報刊雜誌中關於歐美日療養院的報導頗豐，筆者無法在此一一列舉。

19 關於清代湯泉行宮的建築空間布局與行宮活動，參見宋玲平，《清代湯泉行宮》（北京：故宮出版社，2023）。

20 〈袁克定由德國返國內之消息〉，《協和報》，第 4 年第 11 期（1913 年 12 月 13 日），頁 16；〈袁克定之辯白〉，《善導報》，期 34（1915 年 9 月 24 日），頁 360。

21 韋爾巽，〈湯山溫泉水化驗報告〉，《中華醫學雜誌》，卷 4 期 2（1918 年 6 月），頁 81-82。

飯店內有兩處溫泉浴室，通過地下水系統引泉水入池並排出廢水。這裡成爲民國年間北京郊區名勝，吸引不少遊人。[22]

自六朝以來，就有關於南湯山溫泉洗浴和日常使用的紀錄。受到現代溫泉療養風潮的啓發，當地政治家和律師陶保晉（1875-1948）購買了南湯山的地產，於 1919 年創建「南湯山興業公司」，並於 1920 年修建鍾湯汽車路，以新式建築布置園林，創建「陶廬」作爲休養沐浴之所。[23]之後，「軍警機關，及地方紳董等，復相繼創設俱樂部，公有林場，公共男女浴池各一所，及小公園旅館等處」。[24]1927 年南京成爲國民黨政府首都之後，蔣介石下令對原有軍警俱樂部重加整頓，之後「凡黨國要人蒞京，或晉謁先總理墓時，必來一遊。藉觀風景，兼以浴身」。而平時週末或節假日中，普通遊客也紛紛前往「平民化」的男女公共浴池洗浴，致使「車水馬龍，不絕於道」。[25]同時，也有低一等的男女浴池供本地和附近居民公用。南湯山溫泉的宣傳也附有由農商部工業化驗所執行的化學成分化驗結果。[26]此外，陶保晉又請人編輯並出版《南湯山志》，以回顧建制歷程，輯錄與南湯山各類名勝相關的史籍、遊記、詩文和雜俎，力圖廣泛宣傳南湯山溫泉勝地。[27]

除了強調六朝以來遺留的文物古蹟與藝文寫作，以增添遊覽追思古意之趣，《南湯山志》中也特別收入不少對於溫泉療養醫治各類慢性疾病的宣傳文章。例如自日本留學歸國的醫師王若儼（1887-1968）就依照日本地質學家山崎百治與尾崎金右衛門所指定的化驗表，出具自己對南湯山溫泉的鑑定報告。他認定南湯山溫泉爲石灰泉之一種，可醫治肺癆以及諸如氣喘、慢性氣管支炎

22 遏雲，〈我國避暑勝地記〉，《武進月報》，卷 1 號 7（1918 年 7 月 15 日），頁 27；張士清，〈遊北平湯山溫泉記〉，《旅行雜誌》，卷 7 號 6（1933 年 6 月），頁 69-70。

23 趙德仁，〈湯山溫泉〉，《地理雜誌》，卷 3 期 3（1930 年 5 月），頁 1-4。奕因，〈湯山溫泉〉，《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號 1708（1936 年 10 月 6 日），頁 33-35。

24 王宗祥，〈南湯山記略（附溫泉化驗表）〉，《會報》，期 43（1928 年 12 月），頁 39。

25 王宗祥，〈南湯山記略（附溫泉化驗表）〉，《會報》，期 43，頁 39。

26 王宗祥，〈南湯山記略（附溫泉化驗表）〉，《會報》，期 43，頁 39-40；趙德仁，〈湯山溫泉〉，《地理雜誌》，卷 3 期 3，頁 2-3。

27 嚴偉編纂，《南湯山志》（南京：南湯山陶廬，1937）。感謝鄭誠爲筆者提供這份材料副本。

等各種慢性呼吸器病、溫疹丹毒寄生性血行性皮膚病、淋疾、肥胖病、糖尿病、軟骨病、以及猩紅熱、僂痲帝斯（rheumatism, 風濕病），並認定除了入浴治療之外，亦可以通過直接飲用來攝入其鈣含量。[28]在溫泉沐浴療養的推廣上，《南湯山志》特別與法國溫泉和美國、日本的溫泉療養比較，介紹各地溫泉療養的情形。例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在喬其亞（Georgia）的溫泉治療癱瘓症，並投入大量資金發展溫泉水療中心，將此類比於陶保晉在南湯山的各項溫泉開發項目。[29]同時亦以吳稚暉（1865-1953）和李濟琛（1885-1959）等黨國要員與社會名流在此洗浴療養而治好了皮膚病爲例，進一步推廣此地。[30]不過，在實際操作中，並沒有發現任何如前所述的專業溫泉醫師入駐，也未見到各種水療設施的紀錄。實際上，南湯山溫泉更多是滿足黨國要員、普通遊客與地方居民的沐浴與休閒社交的目的，而溫泉療養治病僅是作爲附帶的宣傳價值被記錄與推廣。[31]在《南湯山志》的宣傳論述中，「北湯驟盛，南湯繼之」，[32]北京郊區的北湯山和南京郊區的南湯山的溫泉被塑造爲當時中國最時尚的休旅療養勝地。

---

28 嚴偉編纂，《南湯山志》，頁 5-7。儘管其中也提及曾有建立湯山醫院之籌備，但始終未能實現。嚴偉編纂，《南湯山志》，頁 37。「石灰泉」大致對應現今水文地質學（Hydrogeology）對地下水標準分類中碳酸鹽岩層中的溫泉（carbonate springs）。

29 嚴偉編纂，《南湯山志》，頁 41-42、47-49。此處 Georgia 一詞直接引用原書民國的翻譯，作「喬其亞」。「癱瘓症」一詞來自《南湯山志》中原文。1921 年，羅斯福患病後出現了下肢癱瘓，被診斷爲脊髓灰質炎（poliomyelitis）。由其所開辦的水療中心也是專門針對脊髓灰質炎患者。另有當代醫師重新分析症狀，認爲羅斯福實際上是患了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Barré Syndrome），又稱脫髓鞘多發性神經炎。參見 Armond S. Goldman et al., "What Was the Cause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s Paralytic Illness?," *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 11:4 (2003), pp. 232-240.

30 嚴偉編纂，《南湯山志》，頁 41-42。

31 在歐洲溫泉療養勝地經營的過程中，也往往通過使用化學分析和徵求個人證詞來建立其商業經營的正當性。參見 Matthew D. Eddy, "The Sparking Nectar of Spas; or, Mineral Water as a Medically Commodifiable Material in the Province, 1770-1805," in Ursula Klein and Emma Spary, eds., *Materials and Expertis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etween Market and Labora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198-226.

32 嚴偉編纂，《南湯山志》，序頁 1。

北湯山或南湯山溫泉的訪客最常推薦他們通體舒暢的沐浴體驗，認定其「有華清之遺風」。[33]不過現實中，華清池的現代改造才剛剛開始。清末民初之際，西安及關中地區是各方勢力爭奪的戰略要地，華清池在此時處於嚴重失修的廢弛狀態。馮玉祥（1882-1948）在 1927 年成功佔領剛剛遭受八個月圍城的西安之後，開始重修華清池，並由西北軍管理和使用。不過，剛重修好的浴池很快就在後來爆發的地區戰爭中再次遭到破壞。[34]1930 年蔣介石（1887-1975）的國民黨部隊統一北方後，西北局勢已相對穩定。日本入侵的威脅使得西安被國民黨政府選定爲陪都，並於 1932 年被正式改名爲「西京」。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計劃將東部沿海主要城市中的工業遷往西北和西南大後方。[35]作爲建設西京和開發西北計畫的一部分，新成立的陝西省政府建設廳在 1931 年開始對華清池浴池部分進行首次現代整修：「現在省政府爲刷新名勝，裨益衛生起見，委派專員，籌付款項，建築新式池塘，修蓋適當房屋，並種植花草，載植樹木。設備既臻完善，遊沐者日見眾多。」[36]同時亦設立華清池管理處負責日常運營。新建浴池分爲四個不同價位的等級：一、在浴池西岸可供兩人沐浴的玉環池（大洋三角）與夕佳樓的第一池；二、在東院夕佳樓前的第二池（大洋二角）；三、中院第四第五第六池（大洋一角）；四、東院第三池以及專供女界沐浴的第七第八池（大洋一分）。不過公共團體和特別來賓則可以免費入浴。[37]其中最爲重要的貴賓包括了時任陝西省主席楊虎城（1893-

33　一塵，〈遊湯山溫泉記〉，《餘興》，號 26（1917 年 3 月），頁 135-137；遏雲，〈我國避暑勝地記〉，《武進月報》，卷 1 號 7，頁 27。

34　華清池管理處編，《華清池志》（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2），頁 35。

35　西安市檔案局、西安市檔案館編，《籌建西京陪都檔案史料選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頁 1-5，144。

36　徐企聖，〈最近陝西之建設〉，《新陝西月刊》，創刊號（1931 年 4 月），頁 90。

37　徐企聖，〈最近陝西之建設〉，《新陝西月刊》，創刊號，頁 101；〈華清池管理處組織規程〉，《新陝西月刊》，卷 1 期 6（1931 年 9 月），頁 131-132。關於民國時期北方興起商業公共女浴所之情形，可參考胡鑫、靳瀟颯，〈北京第一家女浴所創建始末〉，《北京檔案》，2020 年第 4 期，頁 46-49。邱仲麟，〈民國時期北京的女浴所〉，《北京史學》，2022 年秋季刊，頁 3-55。但無論是華清池或是北湯山等其他個案都表明，自明清以來在溫泉所在地就設有女池或女民堂，以提供女性外出沐浴。民國時期在此女浴池之設置並非創舉。參見：Fei Huang, “Bathing

1949）。他曾於 1932 年在此款待時任考試院院長戴季陶（1891-1949），戴氏正是在此次西安之行中宣布了西北開發項目的計畫。[38]

對於華清池之後的進一步建設，在省政府內部討論中則有不同意見。1932 年國民政府中央國醫館副館長，兼華北國醫學院院長施今墨（1881-1969）赴陝應診，便道就浴臨潼溫泉。與北湯山與南湯山溫泉比較，他認爲從醫療角度而言，前兩者僅含硫質，只能治療皮膚諸病，溫度也過高；而驪山溫泉不僅溫度合適，且「硫、碳二素天然配合，能療皮膚癬疥，神經衰弱，心臟痺痲，胃不消化，肺氣虛痛，痛痲質斯及血液不潔諸症」，此外，驪山「爲古名勝地，風景亦不惡，將來能在此建設一大規模之療養院，必能爲醫界放一異彩」。[39] 施氏是民國中醫名家，亦主張中醫「科學化」。[40]但他對南北二湯僅含硫質的認識，與前文所述南湯山溫泉爲石灰泉的化學分析結果並不一致。這顯示各地溫泉化學成分鑑定並無統一標準，或者施氏對溫泉水療的認識並不精準。[41]同時，在省政府內部也曾有關於建立驪山療養院的討論：

> 省府近據慕哲夫等呈稱：「西北自經開發，商業輻輳，市面繁榮，維持市內健康，籌設溫泉療養院，實為應時之需要。爰就驪山下購地建築院所，該地山明水秀，空氣清爽，最宜於病後休養。況溫泉之成分為石灰、硫酸、炭酸、圭酸、鉀、錳、鐵、鹽、明礬、砒素等礦質，作用甚強，將來醫浴並濟，奏效必速。雖屬微舉，未始非輔助社會維持健康之一助。理合將創設驪山溫泉療養院緣由，呈請鑒核備查」等

---

through Time and Landscape," *T'oung Pao*, 109:3/4, pp. 308-351. 宋玲平，《清代湯泉行宮》，頁 29。

38 宋香舟攝，〈華清池之上戴傳賢院長及楊虎臣主席（照片）〉，《良友》，期 78（1933 年 7 月），頁 5。

39 劉三民、裴靖瑜、張青艷主編，《人文臨潼（風景名勝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頁 158。

40 關於施今墨主張中醫「科學化」並將其重新轉化爲「國醫」的過程，參見雷祥麟的相關研究。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p. 172-188.

41 根據前文所敘王若儼的化學成分分析，南湯山約四分之一的含量都爲鈣，其中硫養四（筆者注：此爲民國化學元素名稱，對應現在四氧化硫 SO_4）「雖居多數，然皆與鈣化合，並無遊離硫黃或硫化物之存在。故不得稱之爲硫黃泉也」。嚴偉編纂，《南湯山志》，頁 6。

> 語，當以擬創設溫泉療養院，輔助民眾健康，事屬善舉，自應照准，昨已批示知照矣。[42]

時任第十七路軍副官長慕哲夫的這份提案，尤其強調基於化學成分分析中所體現出的溫泉水療價值，驪山良好的自然環境和空氣質量，及其對民眾健康的助益。這些要點都與當時遍及全球的礦泉療養宗旨契合。如前所述，在一戰後各地溫泉往往成爲士兵和傷兵療養的主要場所之一，這份提案或也與滿足軍方之需有關。不過提案當中所列舉有關溫泉成分的各類「礦質」則爲誤記，實質應爲溫泉化學成分中所含的各類陰陽離子。[43]說明來自軍方的提議可能僅是效仿類似《南湯山志》以各類現代化學與醫學名詞宣傳溫泉療效，增加將此地改建爲療養院的論述正當性。

但新的外來資方很快介入了驪山溫泉的重修與經營。1934 年後，隨著開發西北計畫正式啓動，在知識分子中形成「到西北去」的口號，以及隴海鐵路延伸至西安等基礎設施修建成型，前往西安的人流旅客迅速增多。同時開始計劃興修隴海路臨潼車站至華清池馬路，以便利旅客。[44]因此，常有「外來大商」嗅到商機，屢次向華清池管理處交涉，以期訂立長期合同，「租界華清池房屋地址，以作旅館、療養院、娛樂場等事業之用」。[45]最終，由新改組的陝西省政府與上海銀行在西安簽訂合同，於 1935 年將華清池的經營權轉讓給中國旅行社（下文簡稱「中旅」）。根據合同條款，省府以 0.08%的低息向中旅提供

42 〈驪山療養院〉，《西京日報》，1935 年 2 月 14，第 7 版。

43 應分別爲硫酸根離子、碳酸根離子、硅酸根離子、鉀離子、錳離子、鐵離子。由於筆者並未找到此份提案的原始檔案，無法詳細比對，也可能是報社記者對相關化學成分轉載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但文中所載明礬（含鋁）、砒素（含砷）則未見於任何關於華清池溫泉成分分析中。關於華清池溫泉水的化學成分，先後由 1935 年北平研究院化學所、1958-1959 年陝西省衛生防疫站、1962 年陝西省衛生廳研究所、以及 1974 年陝西省地質隊做過四次分析。參見華清池管理處編，《華清池志》，頁 127-130。筆者感謝萬威麟就本文對化學成分相關分析所提出的意見。

44 〈隴海路臨潼車站至華清池馬路〉，《西京日報》，1934 年 10 月 26 日，第 7 版。類似情況也在歐洲出現，例如鐵路的開通使得礦泉療養吸引了大量來自更廣範圍的外來遊客。可參考註 1 中所列針對德國 Reichenhall 礦泉研究的個案：Adam T. Rosenbaum, “Grounded Modernity in the Bavarian Alp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1, pp. 30-53.

45 〈商民擬租用華清池地建築療養院娛樂場〉，《西京日報》，1933 年 7 月 15 日，第 6 版。

爲期三年的一萬法幣的貸款，以供其翻修華清池，並配備最新的洗浴設施。此外在三年內，中旅還享有每月 200 法幣的補助以防初期未能達成盈利。[46]

成立於 1923 年的中旅是中國最早的現代旅行社。創始人陳光甫（1881-1976）與國民黨政府中的黨國元老高層有密切的個人關係。在政府的支持下，中旅在全國的商業版圖迅速擴張，在各地建立旅行社，投資建設開發旅館，代理各類交通出行訂票業務。1937 年，中旅在中國各地已擁有 43 家分支機構。[47]中旅引入現代旅館的經營模式，特別注重提供現代洗浴設施。在承辦華清池之前，正是中旅在 1920 年代負責管理北湯山的溫泉旅遊交通。[48]在經營華清池的同時，中旅另於 1935 年在西安城內建立第一個擁有現代浴室和自來水的旅館「西京招待所」。[49]在中旅的建設規劃中，溫泉療養的醫用價值並非重點，華清池將被重建爲集合現代旅店、溫泉洗浴爲一體的休閒旅遊度假場所。這正是模擬當時南北二京與東部城市的菁英生活方式，此舉或爲將來西遷的黨國高層與社會菁英階層所準備。[50]或許正是由於中旅與國民黨高層的密切連結，以及經營具現代洗浴設備的旅館和旅遊開發的經驗，使其能夠在開發西北計畫中以極其優惠的條件獲得驪山溫泉經營權。

可見現代溫泉療養休旅風潮在中國盛行之後，二十世紀初期對驪山溫泉的不同改建與經營理念上，曾在公共洗浴、現代療養與旅遊開發上各有偏重。而在具體重修經營與日常維護上，則大致有三股不同的群體先後參與其中：軍方、府方與資方。雖然此三方群體並非截然劃分而相互有所重疊，可以想見其中必然會有不同意見間的衝突或協調。儘管筆者並未查詢到詳細的文字資料，

---

46 〈省政府及本廳關於臨潼華清池旅遊工作〉（1940 年 6 月），《建設廳檔案》，陝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 72-2-148，頁 1-*27*。

47 有關近代中國交通設施的建立對旅遊業的巨大影響，以及中旅在二十世紀中國旅遊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參考 Yajun Mo, *Touring China: A History of Travel Culture,* 1912-194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5-53.

48 張士清，〈遊北平湯山溫泉記〉，《旅行雜誌》，卷 7 號 6，頁 69-70。

49 王蔭樵，《西京遊覽指南》（西安：天津大公報西安分館，1936），頁 136-137。

50 戴季陶，〈中央關於開發西北之計劃〉（1932 年 4 月 21 日），收入西安市檔案館編，《民國開發西北》（西安：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印刷廠，2003），頁 50-52。

但內中細節卻可由驪山溫泉的物質空間改造與劃分中得以窺見。與中央政府高層關係密切的資方中旅，效仿南、北湯山等地的溫泉重建與經營模式，將在帝制時期專供上等階層的溫泉洗浴與園林空間「官池」與「環園」，重建為現代華清池並保有專營權。於是這裡成為民國上等階層的休閒之所，同時也對城市中產菁英遊客開放。省內不同層級的政府機構和在此駐紮的軍隊官兵，只得間斷地管理或勉強維護為本地一般民眾和普通士兵使用的公共洗浴空間。這種由不同群體建設和管理不同等級的溫泉浴池，以區分不同階級、性別和群體對溫泉洗浴的使用，是帝制時期溫泉使用機制的延續。下文將就現代華清池的內外空間分別展開論述。

四、華清池之內：現代浴池、民族復興與溫泉療法

經營華清池，是中旅在中國開創旅遊業的全國布局之一。莫亞軍在民國旅遊與旅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中旅與國民黨政府高層之間的密切聯繫，使其在具體營運中同時具備了作為官方代理為其提供出行服務，與純粹針對一般中上階層售賣旅遊消費之間的模糊角色。她提出中旅作為現代中國旅遊文化的生產者，在旅遊項目的設計、宣傳與推廣中建構出新興的國家空間與集體身分認同。同時，城市中上層菁英亦通過旅遊消費活動，或是在邊地的旅行，展現自己的現代身分。而他們的旅遊或旅行本身也成為一種維護主權和民族自豪感的方式。[51]下文也將論及在中旅接管華清池後，在各類旅遊推廣文宣與知識菁英的西北遊記中華清池的形象，及其在西安事變之後被進一步重塑為民族復興之所的過程。不過，某些在近代邊地旅遊或學術考察旅行中所呈現出由外來菁英所主導的國家想像與民族建構話語，也可視為對他們在紛亂時局中尚能保持出行與學術考察自由、甚或是享受異地風情的一種正名之舉。與此同時，中外來

51 Yajun Mo, *Touring China*, pp. 3-10. 莫亞軍書中對民國時期“Travel Culture”的討論，同時涵蓋了中文語境中的「旅遊」與「旅行」活動，因此不僅包含了新興中上階級的休閒旅遊消費活動（tourist activities），還討論了知識菁英在邊地的各類學術考察之旅（frontier explorations）以及戰時旅行（wartime travel）。

訪客的具體感官享受與實際遊訪動機、專職水療醫師對溫泉療養的不同使用與規劃意見，以及各類在地與外來中下階層民眾承襲對溫泉經年累月的日常使用，則是驪山華清池這一個案所能展現出的多重面向。

1935 年，新改造的華清池正式開始對外營業。重新修建的現代地下水管道系統將天然溫泉水引入不同建築中的各個浴池。新修的浴池分爲三等，洗浴費用分別爲 1、0.6、0.3 法幣。其中一等級的貴妃池可容納一至四人洗浴，而單人池則相對較小，兩者都爲私人沐浴而設計。二等和三等浴池是公共浴池，最多可容納十人一起洗浴。這三類浴池都鋪設了新的白色瓷磚，以符合現代衛生條件，並配有供水管道系統，使得溫泉水可以自動放入並流出浴池。[52]中旅也向浴客公布溫泉水符合華氏 109 度的科學溫度標準，並列出其主要化學成分爲 30%硫酸鈉、20%氯化鈉和 9%石灰（氧化鈣）。[53]雖然如此，華清池溫泉療疾的功效並非對外宣傳的重點。報紙、雜誌和旅遊指南的相關報導皆強調其全新洗浴設施和內部園林風光。這一時期城市遊客前往華清池後所撰寫的遊記也頻繁見諸報端。遊人大多描述了在清潔浴池中舒適放鬆的洗浴體驗，以及對園林風景和內部「歐化」裝修的深刻印象。[54]在一篇對華清池極度讚嘆的遊記中說到，這裡的溫泉浴池「比南京湯山溫泉池強的多了」，不僅水池清潔，沐浴後還可躺在浴池旁的藤椅上小睡片刻，醒來又可再洗一輪。而優雅清潔的旅社房間也令「俗不可耐的上海國際飯店松鶴軒，望塵莫及」。[55]訪客亦可以在環園中散步，在人工湖中心小島的亭中納涼，在園子裡的餐堂用餐，或從環園後登上驪山賞景。中旅還在環園中建了五間客房，每晚費用 1.5 法幣，以供遊客停宿。[56]不過，此時華清池主要的訪客還是達官貴人。臨潼縣的地方官員，正如明清時期一樣，莫不以侍奉顯要爲苦。1940 年代在臨潼當地流傳的笑談，

52 〈貴妃賜浴的華清池〉，《興華》，卷 33 期 50（1936 年 12 月），頁 29。
53 孫元徵，〈華清池〉，《責善》，卷 2 號 5（1941 年 6 月），頁 21。
54 例如：周開慶，〈瞻謁周秦漢諸朝陵墓〉，《教與學》，卷 2 期 4（1936 年 10 月），頁 213-215。
55 平山，〈華清池〉，《茶話》，期 7（1946 年 12 月），頁 32-36。
56 周開慶，〈瞻謁周秦漢諸朝陵墓〉，《教與學》，卷 2 期 4，頁 213-215；〈貴妃賜浴的華清池〉，《興華》，卷 33 期 50，頁 29。

說曾有左縣長「無日不伴達官貴人，就浴於此。……一日間先後去衣就浴者，乃達七次之多，因自號『脫褲縣長』」。[57]

最爲顯貴的訪客，自然是在 1936 年在此下榻的蔣介石。12 月 12 日清晨，蔣介石得知兵變消息後，立刻從所住的環園後門逃上驪山，躲在半山腰的一塊巨石之後。被捕後的蔣介石被關在西安城內的楊虎城官舍中（附圖 1）。這一詳細而生動的經歷出自蔣介石自述、實則由陳布雷執筆的回憶錄中。[58]回憶錄在事變後立刻出版公諸於世，反映出蔣介石在遭受巨大羞辱之後，試圖主導公眾輿論對西安事變的認知。回憶錄特別強調，這一事件是中華民族歷史的關鍵轉折點，釋放蔣介石對延長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和民族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而這一敘述也爲之後的主流報道和宣傳定下了關鍵基調。[59]與此同時，華清池與驪山的景觀相應被重新改造。1937 年，國家軍事委員會在據說是蔣介石藏身之處的「虎畔石」前，建造了一座紀念性的石亭作爲蔣介石「蒙難處」。[60]在新一輪的宣傳中，這塊巨石也被改名爲「民族復興紀念石」，成爲抗日宣傳的一部分。[61]同年，省政府啓動在華清池後約 70 畝山地上興建驪山森林公園的計畫。[62]華清池後門可步行登上驪山的小徑被整修爲石階，環園外東側又特別加修一條名爲「進德路」的汽車路直通蒙難處，並在山腳新修一處門樓作爲正門。[63]在這次新修汽車公路中，蒙難處被設計爲一個重要的節點，成爲繼華清

57　無懷，〈華清池之脫褲縣長〉，《海光》，期 16（1946 年 3 月 20 日），第 7 版。

58　蔣介石，《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南京：正中書局，1937），頁 5-10。

59　蔣介石，《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頁 2；蔣介石，〈蔣委員長離陝前對張楊之訓話〉，收入《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附錄頁 1；宋美齡，《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南京：正中書局，1937），頁 34。

60　〈驪山建蔣委員長蒙難亭〉，《興華》，卷 34 期 22（1937 年 6 月），頁 25。

61　孫元徵，〈華清池〉，《責善》，卷 2 號 5，頁 20-23。

62　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詳細論述驪山的造林歷史。由於在 1930 年代初期，驪山的樹木幾乎被砍伐一空，因此爲了配合西京建設，省政府在 1931、1937、1941 和 1946 年多次啓動造林項目。王光如，〈一月來陝西之建設：驪山造林紀實〉，《新陝西月刊》，卷 1 期 3（1931 年 6 月），頁 114-115；森林果木組，〈驪山造林計劃〉，《陝農月報》，卷 2 期 6（1941 年 7 月），頁 30-34。

63　〈有關驪山造林、驪山森林計劃書〉（1937 年 7 月），頁 1-20，《林務局檔案》，陝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 94-1-174。

池後驪山半山上的重要景觀。之後造訪此地的許多軍政界名流，如陳誠（1898-1965）、胡宗南（1896-1962）等，均題字鐫石以志紀念。[64]在重建西安事變的民族主義敘事時，此舉也有增添驪山風景，吸引遊人而增加政府收入的企圖。1937 年，西安和臨潼之間的西潼風景路竣工，加上之前開通的隴海鐵路，使得越來越多的遊客能夠方便地前往華清池和驪山，並參觀附近的秦始皇帝陵。[65]在週六週日，「長安達官貴人、鉅商大賈、空軍健兒、軍人（尤其是汽車兵團！）紛紛攜眷駕轎車吉普車來臨了，沒錢的騎自行車搭大車搭野雞卡車火車紛沓而至，這日華清池眞是車如龍馬如水了，粗看去和那塞北廟會沒有二樣。」[66]此時，華清池的旅遊經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中旅因此在華清池建造了更多的客房，並再次翻新餐廳和浴池。[67]1939 年底至 1940 年 6 月間，中旅在華清池的經營已進入盈利階段，淨收入爲 3,382.63 法幣。[68]

西安事變後的一些旅遊推廣與遊記中，驪山與華清池儼然成爲「對民族復興至關重要」的景點。[69]這類充滿民族主義的敘事結構，固然有維護蔣介石領袖地位的意味，但恐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爲了在國難當下遊山玩水之舉賦予一種正當性論述。畢竟在人民流離失所之際的休閒享樂之旅，多少顯得不合時宜。[70]撇開這些表面上「政治正確」的論述，更多的普通遊客大多出於獵奇的心理來到此地：對貴妃出浴的曖昧情色想像，以及西安事變的戲劇性情節張力，恐怕比民族主義教育更具吸引力。見諸報端中對沐浴華清池個人體驗的描

64 〈驪山虎畔石之題字〉，《西京日報》，1937 年 6 月 30 日，第 6 版。

65 〈隴海路臨潼車站至華清池馬路〉，《西京日報》，1934 年 10 月 26 日，第 7 版。

66 平山，〈華清池〉，《茶話》，期 7，頁 32。

67 西京籌備委員會，〈關於修理臨潼華清池房屋橋樑〉（1930 年 6 月），頁 1-7，西安市檔案館藏，02-01-414。

68 〈關於據送經辦臨潼華清池管理處 1948 年下期收支決算報告的公函〉（1948 年 3 月），頁 1-25，《建設廳檔案》，陝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 72-2-1241。

69 例如：「民族復興紀念石……眞足燦爛奪目，象徵著民族復興。」冰瑩，〈憶驪山〉，《新中國月報》，新卷 1 期 1（1946 年 9 月），頁 15-16。

70 例如署名爲 SM 的作者記錄了他在遊華清池時的矛盾心情：「到底，坐在華清池裡，欄杆邊看荷葉和水馬，這樣的時候，是忘卻戰爭麼？現在我底回答是不！……因爲，我底故鄉，我們底江南景色，正是在這個戰爭中失去的，也將從這個戰爭中收復。」SM，〈在華清池〉，《自由中國》，新卷 1 期 5/6（1942 年 1 月），頁 *53*。

述，都不免提及他們遙想楊玉環在此沐浴之情節。「貴妃出浴圖」原本就是明清時期仕女畫的主題之一，並一直延續至民國時期，成為 1930-1940 年代摩登上海的現代都市消費的重要文化產品（附圖 2）。[71]中旅在華清池售票處懸掛貴妃出浴石像照片以吸引遊客。[72]華清池中的「貴妃池」也往往接受情侶雙人沐浴。[73]在前述所提及的遊記中，作者坦白，「人們去華清池，惟一的目的，便是洗澡，又因為歷史的艷跡深刻地印留在每個人的腦海裡！去了，誰不雙雙，誰不對對」。甚至，當時尚且單身的作者還被朋友建議應當先去西安開元寺，那裡自 1930 年代戰後主要為外來「蘇楊幫」妓女聚集地：「叫一個去，聊以勝無，也可一嘗當年李三郎的一段風流佳話。」[74]而在西安事變之後的遊客，這種窺視欲又被附加在曾被俘的蔣介石上。他們往往偷窺或者搶著入住傳說中蔣介石曾住過的 26 號房間：「認為只有那張總統用過的鋼絲床上一睡才過癮。」[75]在此，遊客們既可沉浸於現代舒適清潔的溫泉浴池之內，又可神遊於過往的香艷奇情之中。但對於某些見多識廣的遊客而言，也會略感失望，因

---

71 陳建華近期關注 1930-1940 年代上海的女體日常消費議題，指出自明代仇英繪「貴妃出浴圖」之後，此母題一直延續至民國時期的各類「貴妃出浴圖」，以此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同時也在近代海濱浴場開始盛行的社會背景下，出現了更多的「海濱出浴圖」，從而將女體轉化為公共性的窺視對象。陳建華，〈楊貴妃「出浴」與摩登上海〉，《澎湃新聞》，2018 年 9 月 29 日，https://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479481&from=yidian （2023 年 7 月 27 日檢索）。關於近代中國在海濱浴場中可以自由展示身體的現代性討論，亦可參考 António Eduardo Hawthorne Barrento, "Going Modern," *Modern Asian Studies*, 52:4, pp. 1089-1133.

72 據在華清池任職的員役舒廷沛的紀錄，有遊客看見售票處牆上掛的一張 24 寸貴妃出浴石像照片：「楊貴妃並不漂亮，你看她面部那麼豐滿，右手卻那麼細小。」舒廷沛，〈星期日的華清池〉，《旅光》，卷 1 期 4（1940 年 9 月），頁 12-13。此文並未附圖，但依據具體描述，筆者猜測可能與當時在不同報刊中刊登的楊玉環玉石浮雕像的照片為同一圖像，以在媒體上推廣華清池。圖像具體來源不明，《時事新報》記為「逍遙閣藏版」，《時事新報》，1933 年 2 月 26 日，第 1 版第 5 張；而《新社會》雜誌則記為王錫符所拍攝，原件「為白玉石彫製，昔存馬嵬驛，今已為人盜去」。王錫符，〈貞麗遺蹟：臨潼驪山全景（照片）〉，《新社會》，卷 7 期 9（1934 年 11 月），封底插圖。此照片亦見於其他報載遊記中，例如周開慶，〈瞻謁周秦漢諸朝陵墓〉，《教與學》，卷 2 期 4，頁 215。

73 例如王栻，〈長安遊記之一：華清池〉，《市街》，期 3（1936 年 2 月），頁 14-15。

74 平山，〈華清池〉，《茶話》，期 7，頁 32。

75 伯恆，〈華清池之貴妃池外景〉，《今日畫報》，創刊號（1948 年 7 月），頁 10。

爲所謂的貴妃池，「倒像現在上海一般摩登姑娘沐浴的地方，更尋不出我們楊家貴妃的一點遺影」。[76]

在當時致力發展溫泉療養治療的醫師陳炎冰（1903-1996）眼中，中旅在華清池的現代旅遊開發是嚴重的醫療資源浪費。陳炎冰在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後於 1928 年進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成爲藤浪剛一（1880-1942）教授的學生。藤浪是首位在日本從事放射線醫學研究的醫師，曾於 1909 至 1912 年在維也納大學學習。藤浪的另一個研究興趣就是在日本推廣基於歐洲模式的現代溫泉療養院，並對德語區溫泉的溫泉療養有深入研究，翻譯和彙編了相關書籍。[77]受到藤浪的影響，陳炎冰自此投身於溫泉療法的研究，1934 年回國後亦一直致力於推廣溫泉療養院建設。他在 1936 年至 1940 年期間完成了《中國溫泉考》和《溫泉與醫療》兩部著作。前者是從二十六個省的方志以及各種地方紀錄中匯集五百多條分布於中國各處的溫泉歷史紀錄；後者則主要是集合藤浪剛一和另一位專攻溫泉療養的日本醫師西川義方（1880-1968）以及其他日本原版書的翻譯和彙編，集中介紹歐洲和日本溫泉療養院的情況。[78]「就德國方面觀之，全國不過八十二處之溫泉，而設備五百五十所宏偉之溫泉療養院，只美國一國之療養者每年在德溫泉地消費二千萬金；國內溫泉研究機關林立，治療業蹟〔績〕之發表，日有所聞，溫泉書類之出版，更屬汗牛充棟。他如英、

---

76 周開慶，〈瞻謁周秦漢諸朝陵墓〉，《教與學》，卷 2 期 4，頁 215。

77 藤浪剛一，《東西沐浴史話》（京都：人文書院，1931）；藤浪剛一，《溫泉知識》（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38）。

78 陳炎冰，《中國溫泉考》（上海：中華書局，1939）；陳炎冰，《溫泉與醫療》（上海：中華書局，1940）。筆者將《溫泉與醫療》一書與西川義方相關出版著作比較後發現，陳炎冰關於歐洲溫泉知識的論述，部分來自他對西川下列著作的中文翻譯：西川義方，《溫泉と健康》（東京：南山堂書店，1932）；西川義方，《溫泉須知》（東京：診断と治療社出版部，1937）；西川義方，《溫泉読本》（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38）。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全面討論陳炎冰的相關著述，參見筆者另文：Fei Huang, "Spa Treatment, Geothermal Resources, and Mass Consumption: Rediscovering the Hot Springs in Mod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Frankfurt, Germany, 21-25th August 2023, https://www.uni-frankfurt.de/141379062.pdf.

美、法、日、諸國，亦莫不孜孜於溫泉事業之發展，誠以溫泉對於人體，確有增進健康及治療痼疾之靈效故也。」[79]

作爲一個渴望在中國發展溫泉療法的醫師，陳炎冰特別注意收集二十世紀初各地興起的公共溫泉洗浴信息，其中之一就是華清池：「又查驪山之地勢與氣候頗爲適宜，既得良好之溫泉，又有幽雅之公園，誠爲理想之保健療養地，惟此種事業尚無人過問，良堪惋惜。」[80]隨後，陳炎冰又於 1946 年發表了他給華清池管理處的一封公開信，批評來到華清池的人大多帶有「洗凝脂」、「嬌無力」的色情慾。而根據對方提供的華清池溫泉分析表，他認定華清池屬於「單純泉」，[81]既不含硫磺質，溫度也不高。在辨析所閱讀的其他文獻和地方流俗紀錄，他得出結論：「華清池溫泉，是能治療皮膚病，不孕症，一般慢性病。」[82]最後，他依據單純泉的飲泉療法和浴泉療法，列出各種能夠被醫治的具體症狀，並將其列成表格，希望公布在華清池管理處，並建議另設一部門專司其責，以發揚利用其醫療功能。[83]

陳炎冰極力倡導以水療學爲標準，建造專門用於治療疾病的溫泉療養院，而非迎合遊客的遊樂所。他批評當時在中國北湯山、南湯山等少數幾處溫泉開發只是「限於普通澡堂式之設備而已；其不適應於現代溫泉療養之要求，自無

79 陳炎冰，《溫泉與醫療》，頁 1。

80 陳炎冰，《中國溫泉考》，頁 101。除此之外，陳炎冰還討論了北湯山溫泉、河北黑龍潭溫泉、安徽黃山溫泉、湖北應城玉女泉、福建漳州、何田、新泉的溫泉、廣西容縣溫泉、雲南安寧溫泉和廣東從化溫泉，這些都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建立的溫泉療養勝地。

81 陳炎冰此處所採用的是當時日本藥學會協定之溫泉分類法，將華清池泉歸爲單純溫泉，是指常保持攝氏 25 度以上的溫度，泉水一公升中游離碳酸（CO_2）與固形成分的含量均不滿一公分，或固形成分雖滿一公分以上，但以酸性碳酸離子、鈣離子、鎂離子等爲主要成分。陳炎冰，《溫泉與醫療》，頁 7-8。

82 其中不孕症之討論即對應下節討論的地方流俗認爲夫妻同浴可得子。陳炎冰在這封信中闡述其原因並非夫妻同浴，而是因爲單純溫泉浴療法可以溫暖下腹部，且洗滌陰道，消除炎症從而容易受孕。但陳氏此說並無當代醫學證明。

83 陳炎冰，〈給華清池管理處一封公開的信：討論華清池溫泉的醫療作用〉，《旅行雜誌》，卷 18 期 12（1944 年 12 月），頁 73-75。

待言」。[84]但陳炎冰的呼籲並未能引起政府的注意，也不爲經營華清池的中旅所重視。他的雄心壯志僅停留在紙面論述上。

與前文所述近代中國出現的各類關於溫泉療養的醫療論述相比，陳炎冰看似是更加系統且深入掌握水療知識的專家。但實際上，他所介紹的關於歐洲的溫泉療養所以及他對華清池溫泉醫療效果的判斷，都是源於二手材料，並挪用日本學者從西歐，尤其是德語區所引介的關於水療法的二手知識。然而正如前文所介紹，此時歐洲溫泉療養所的建設與經營重點始終在治療和休閒娛樂之間來回擺盪，甚至在很多地方，娛樂休閒的設備和安排遠遠超過了療養的考量。例如德國 Baden-Baden 溫泉療養所在十九世紀聲名鵲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那裡夜夜笙歌的社交晚會和華麗盛大的賭場。此外，十九世紀下半葉臨床醫學與實驗室醫學在醫學界已逐漸成爲顯學，而以經驗觀察爲主的礦泉療法，並未通過當時現代科學和嚴謹的臨床驗證。因此，德語區中的礦泉療養醫師（Kurarzt/Brunnenarzt）或浴療師（Badearzt）在醫學界屢被輕視和質疑。面對這些挑戰，當時有部分礦泉療養從業者開始改稱他們從事浴療學（Balneologie）或水療學（Hydroposie/Pegologie）以重新獲得威望。同時他們也採用現代科學語言來重新歸類整理溫泉療養知識，編寫並廣泛推出溫泉水療的學術論文與普及手冊。[85]不過，雖然溫泉療養這類自然療法在醫界的學術討論中逐漸被邊緣化，但在實際使用中依然有相當的延續性。由於直到二戰之後才研製出針對結核菌的抗生素，因而氣候療法或礦泉水療等自然療法，在不少地方依然被作爲肺結核康復療法，並一直延續到 1960 年代。[86]只是歐洲醫學和礦泉療養的發展脈絡，並非僅能從日本學界的二手知識獲取新知的陳炎冰所能瞭解。實際上，無論是他的日本導師還是他自己所極力推崇的「歐洲的現代療養院的科學

84 陳炎冰，《溫泉與醫療》，頁 204。

85 參見註 1，尤其是 Karl E. Wood 以德國 Baden-Baden 爲個案進行的分析。Karl E. Wood, *Health and Hazard: Spa Culture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86 關於十九至二十世紀結核病知識與相應治療手段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發展，以及從病患角度反思肺結核療養院作爲一種傳統治療方式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延續，參見 Flurin Condrau, "'Who Is the Captain of All These Men of Death?',"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2:2, pp. 243-262.

和醫療標準」，已是面臨邊緣化的歐洲水療從業者試圖進入科學化的醫學界所作出的最後努力。

五、華清池之外：民眾浴池、軍人浴池與公共衛生

由中旅重建的華清池中的歐化浴池、客房和中式花園是在晚清時期的「官池」和「環園」的基礎上改造而成，同時保留了前門和環園後可直通驪山的後門。而在相對邊緣的西北角，則保留了免費公共洗浴空間，即「民眾浴池」和「婦女浴池」（附圖 1、3、4）。[87]前來此處沐浴的主要是本地農民和進城務工的苦力，他們在一天繁重的勞動後，來此洗澡放鬆。[88]當地幾十個婦女往往結伴而來，「扶老攜幼，共浴其中，熙熙攘攘，很是熱鬧」。[89]此外，附近居民歷來也有用溫泉水洗衣的習慣，以及利用溫泉水灌溉作物的農作方式。[90]這兩處浴池極有可能是 1927 年或 1931 年重修後被保留下來，並在中旅 1935 年改建華清池之後，被隔離在其重點經營的浴池之外，以供本地一般平民使用，並由臨潼縣縣政府管理。[91]在近代北湯山和南湯山溫泉洗浴的改造中，也可見到類似的溫泉公共空間的劃分。在南湯山的陶廬之外，也有留給當地村民的溫泉公共洗浴場所。[92]

陳炎冰指責中國所謂溫泉療養都只是普通商業澡堂的翻版。的確，民國時期的公共洗浴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明清以來商業澡堂的經營與消費概念，浴客

87　如附圖 3 所示，進入大眾池是免費的。莊澤宣在 1936 年所寫的遊記中提到，一個人在大眾池洗澡也只需支付兩個銅錢的價格。莊澤宣，〈西京小遊〉，《新中華》，卷 4 期 24（1936 年 12 月），頁 70。

88　金芸，〈驪山紀游〉，《西北論衡》，卷 5 期 5（1937 年 5 月），頁 69-73。

89　孫元徵，〈華清池〉，《責善》，卷 2 號 5，頁 22。

90　〔清〕史傳遠纂修，《臨潼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 1，頁 16b。

91　〈省二民教館舉行館務會議〉，《西京日報》，1936 年 8 月 9 日，第 7 版。

92　王宗祥，〈南湯山記略（附溫泉化驗表）〉，《會報》，期 43，頁 39-40；趙德仁，〈湯山溫泉〉，《地理雜誌》，卷 3 期 3，頁 1-4。

更多是爲了享受浸泡在熱湯中的通體舒適與經營方所提供的周至服務。[93]況且這類澡堂由於人多混雜，一旦換水不勤，就容易藏汙納垢，成爲現代城市公共衛生建設中需要重點監督與改造的對象。而中旅所經營的溫泉洗浴得以脫穎而出，也因其新式浴池較容易維持相對清潔。[94]因此，驪山腳下這兩處公共浴池的水源雖與中旅所經營的溫泉洗浴相同，但在清潔維持和日常維護上卻天差地別。雖然按規定公共浴池的池水理應每天更換一次，但在實際操作上，由於沒有如同華清池內部的精心管理，這兩處免費的公共浴池往往成爲環境汙染的來源。根據 1936 年的數份地方報導，華清池附近乞丐成群、垃圾亂堆、便溺狼藉、小販雜亂，華清池附近各浴池放水溝及民眾洗衣池水道也久不疏通，泥垢淤積，汙穢不堪。[95]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北方曾多次爆發饑荒和各種流行病，陝西省於 1930 至 1932 年爆發鼠疫和霍亂，先後導致超過十萬人死亡。[96]因此改善公共衛生條件也是西北開發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隨著新生活運動的推廣以及政府對公共衛生的逐漸重視，臨潼縣政府也數次函請中旅設法整理，但始終沒有效果。[97]顯然，由於權責不清，縣政府與中旅華清池之間互相推諉，最後由省第二民眾教育館出資，商同地方駐軍派兵出工修理。[98]

民眾教育館是國民黨政府於 1927 年後積極在全國各處推廣的新興綜合性社會教育機構，主要任務是進行鄉村建設和提高民眾文化水平。[99]陝西省第二

93 有關明清時期的商業澡堂，可參考游欣婷，〈明清澡堂的發展與社會互動〉（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94 舒廷沛，〈星期日的華清池〉，《旅光》，卷 1 期 4，頁 12。

95 〈臨潼籌備舉行夏令衛生運動〉，《西京日報》，1936 年 7 月 3 日，第 6 版；〈省二民教館舉行館務會議〉，《西京日報》，1936 年 8 月 9 日，第 7 版。

96 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省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卷 72，〈衛生志〉，頁 164。

97 〈臨潼籌備舉行夏令衛生運動〉，《西京日報》，1936 年 7 月 3 日，第 6 版。

98 之後此處浴池曾短暫收取銅元二枚作爲每次浴費。〈華清池出水道兵工開始修理〉，《西京日報》，1936 年 9 月 20 日，第 7 版；莊澤宣，〈西京小遊〉，《新中華》，卷 4 期 24，頁 70。

99 關於近代民眾教育館整體情況的研究，參見周慧梅，《近代民眾教育館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陝西省第一民眾教育館於 1931 年成立。關於陝西省第一民眾教育館的研究，參見吳善家，〈陝西省民眾教育館研究：以西安和長安地區爲中心〉（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

民眾教育館於 1934 年在臨潼設立，如附圖 1 所示，民眾教育館位居民眾池和婦女池之間的中心位置。[100]省第二民眾教育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在地方「破除迷信」和「改良風俗」。館內設有圖書、期刊和報紙的閱覽室，同時也為兒童和文盲的成人提供小學教室，並在周圍十村演講，舉辦簡易識字流動班。時任館長孟希天曾一度雄心壯志，致力於從公共衛生、民眾教育等各個方面重新徹底改造民眾浴池：

> （一）改良民眾男池，因為房屋湫隘，池底卑下，故擬從新改建偉大房所，及深淺三級較為廣闊的池底。（二）改良民眾女池，因為附近婦女多在池內洗頭修足，汙濁不堪，除規定禁例外，擬亦重加改造。（三）建修自來水塔，或即以打水機吸去泉源之水用做淋浴。（四）平均灌田水量，因為附近居民利用浴池退水灌田，東西兩村時起爭執，應協同雙方勘測水量，按地畝確數平均分配。（五）創設旅館，為了西安離此有五十里之遙，即他鄉遊客來此沐浴，一浴之後便爾歸去，則天熱灰大，殊失興趣。故擬於西院舊有房屋加以修葺，闢為旅館，以便旅客休息。（六）建築露天游泳池，在西北游泳池真是不易看到，此處既有活潑的泉源，並且十分的溫和，建築水池真可說事半而功倍。[101]

但 1935 年由中旅所經營的華清池正式開始營業之後，孟希天的計畫大都沒有實現。不過，這些計畫反映出民國在地知識分子對於公共衛生建設的藍圖，同時提倡更為衛生的淋浴設施，也符合二十世紀初開始出現的最新洗浴衛生習慣。此外，關於東西二村村民利用浴池退水灌田的爭執，也與前述在地居民自帝制晚期以來對當地溫泉水資源再循環利用的傳統相呼應。由於華清池外的民眾池與中旅所經營的華清池有著截然不同的經營重點，可以想見私人資本並不願參與民眾池區域的管理與改造，而地方政府亦無力全盤推進這樣的宏偉藍

100　〈二民教館週年紀念〉，《西京日報》，1934 年 12 月 16 日，第 7 版。
101　米星如，〈華清池滌暑記〉，收入陳光垚著（下略），《西京之現況》（上海：西京籌備委員會，1933），頁 177。

圖。很快地，省第二民眾教育館就在 1936 年後部分遷移至渭南，而所剩之空院則由縣府在此設立縣衛生院，由一名醫師攜帶藥箱，爲附近十村巡迴治療。[102] 臨潼縣特別強調在此設立衛生院的原因，正是「華清池附近，有林泉之勝，最適於療養疾病」。[103]

臨潼縣政府將衛生院設立於此，也暗合本地居民長期對驪山溫泉能醫治百病的民間信仰。在臨潼當地的游春散病風俗中，本縣人會在三月三日聚集在驪山溫泉：「沐浴桃花水，滌百病。」[104]此外，據 1914 年的一則遊記，自明清以來對洗浴溫泉醫治不孕症的民間信仰依然沿襲至二十世紀：「秦人無子者，往往夫妻同浴於此，謂可得子，亦流俗之迷信也。」[105]這處在民間信仰中可以療治百病的溫泉，也吸引了遠自數百里來此就浴以求治癒的信眾。[106]「本地人，只要生了瘡的，臨潼百里之內，都會似勞山道上到這兒來焚香沐浴。」[107] 總之，雖然報刊雜誌和遊記中充斥了與溫泉相關的盛唐風華的文化記憶與民族主義意識的建構話語，溫泉洗浴對於在地居民更爲重要的面向，除了用於日常洗浴之外，亦有借此「洗病」的習俗傳統。驪山與華清池在明清時期是本地最爲重要的廟會和朝香所在，正如德國記者兼軍官 Erich von Salzmann 所觀察到的，在溫泉的源頭是前來洗病的平民主要祭祀中心。進入二十世紀初，從前在溫泉源頭的神聖空間被封閉在中旅所管理的華清池內部，並被改造成爲溫泉勝地的觀景臺。但明清時期集中在溫泉源頭處的祭祀習俗並未完全消失，二十世紀初在驪山溫泉區附近唯一保留的祭祀空間，從原來的溫泉源頭處移動至位於民眾浴池前的禹王廟。[108]當地前來治療疾病的人相信他們在進入溫泉澡池前，

102 莊澤宣，〈西京小遊〉，《新中華》，卷 4 期 24，頁 70。

103 〈臨潼設立衛生院〉，《西京日報》，1936 年 3 月 27 日，第 6 版；〈省二民教館移渭南，華清池設衛生院〉，《西京日報》，1936 年 5 月 10 日，第 7 版。

104 陝西省臨潼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臨潼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1019。

105 韻秋，〈秦還日記〉，《小說月報》，卷 5 號 7（1914 年 10 月），頁 2。

106 米星如，〈華清池滌暑記〉，收入《西京之現況》，頁 176。

107 平山，〈華清池〉，《茶話》，期 7，頁 32。

108 禹王廟的修築時間並不清楚，筆者所見最早的紀錄來自清代乾隆年間的方志，禹王廟中被列入「群祀」類別中。這也表明它曾是獲得官方認可的祭祀空間，或許因此一直保留至民國年間。〔清〕史傳遠纂修，《臨潼縣志》，卷 3，頁 13b。在方志紀錄中，禹王廟又名十王殿。一般來

必須在此虔拜祝禱，「否則便洗一生也不會好」。[109]也正因如此，省第二民眾教育館初期的識字和破除迷信運動，往往都在禹王廟會期間進行，以期達到擴大宣傳的效果。[110]因此，當陳炎冰批評中旅將華清池經營為遊樂場，且外來遊客都以尋古獵奇之心造訪此地時，他所期待以溫泉作為治療疾病的手段，反而在本地傳統的「洗病」習俗與進香活動中持久不衰。

除了來自各地的遊客和當地的居民外，驪山溫泉的另一群最為主要的使用者是軍隊官兵或地方武裝分子。二十世紀上半葉是戰火不斷的年代，從軍事角度而言，驪山是西安東郊的關鍵戰略高地。驪山中各種武裝力量的存在也揭示出華清池溫泉使用的另一面向。日本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在 1917 年的中國旅行報告中提到，當時有軍隊駐紮在驪山溫泉，同時那裡的土匪頻頻製造騷亂。[111]瑞典藝術史學者喜仁龍 Osvald Sirén（1879-1966）在 1921 年來到驪山華清池，也注意到過去的私人浴池和大眾浴池都已經荒廢，不過「士兵們正在盡情享受溫泉沐浴的樂趣」。[112]而 1927 年馮玉祥對驪山溫泉的第一次整修，也是為了提供西北軍軍官和士兵的洗浴服務。1931 年，新成立的陝西省政府接管華清池並進行第二次整修後，在地駐紮的士兵便是主要使用群體。1933 年的一篇遊記提及華清池上貼有不少「怪標語」，諸如「洗澡不忘抗日」或「救國不忘

說，「十王殿」通常是指地獄十殿中主持審判並對死者進行懲罰的十王。關於十王殿的總體研究，可參考 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Rostislav Berezkin, *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pp. 156-173. 不過，目前並不清楚這座禹王殿或十王殿具體供奉的神靈。根據 2019 年 6 月 30 日筆者在驪山石甕寺對張桂蘭女士（88 歲）的訪談，在她的記憶中，1940 年代的十王殿是玉皇大帝位於中央，十王分列他的兩側。關於明清時期華清溫泉源頭民間信仰的具體分析，參見筆者文章：Fei Huang, “Bathing through Time and Landscape,” *T’oung Pao*, 109:3/4, pp. 308-351.

109 平山，〈華清池〉，《茶話》，期 7，頁 35；米星如，〈華清池滌暑記〉，收入《西京之現況》，頁 176。

110 〈省二民教館擴大識字運動〉，《西京日報》，1934 年 3 月 4 日，第 7 版。

111 滬友會編，楊華等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 303-304。

112 Osvald Sirén, “The Journey to Sianfu,” *The Theosophical Path*, 24:6 (1923), pp. 578-593, esp. pp. 592-593.

濯身」。外地的遊客不能理解為何在華清池會有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宣傳口號。[113]在中旅接管華清池後，軍官士兵對溫泉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被快速發展的旅遊業掩蓋。前述的一篇遊記中已提及每到週末都有大量軍官與普通士兵前來洗浴。可以想見，上層軍官可以進入中旅華清池，而大量下層士兵則使用其他的免費浴池。至少在 1936 年的一篇遊記中，作者注意到，當時華清溫泉分為供民眾和軍人使用的免費浴池，以及供上層階級的士女使用的收費浴池。[114]這恐怕也是當民眾浴池由於缺乏日常管理而嚴重汙染之後，地方駐軍願意出面派兵出工修理的原因之一。

軍人士兵頻頻前往驪山溫泉洗澡的重要原因，除了在備戰之餘放鬆身心之外，也有醫治疾病的需求。由於軍旅生活往往衛生條件很差，軍中常發生疥瘡這類皮膚病，而溫泉洗浴則是廉價的治療方式。不過，如果清洗的環境不衛生，也會產生反作用。1940 年代，西安的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的軍校學生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第四團是西安當地最主要的軍事訓練組織之一，戰爭期間有超過來自各地約 24,000 名學生在此軍事訓練，完成後再被派往前線。其中大量從淪陷區逃亡至關中地區的難民也被招募為第四團軍校學生。據一位培訓官員的回憶，第四團幾乎每個學生都患有疥瘡，因此他不得不帶他們到驪山華清池的民眾池中洗澡，希望能夠醫治好他們的皮膚病。然而由於當時公共浴池的衛生條件太差，兩個學生甚至在洗完澡後失去了視力。[115]

除了位於驪山腳下的溫泉，驪山上超過 3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具有潛在的經濟和軍事價值。1942 年，位於驪山南麓的藍田縣政府曾提議設立驪山畜牧場，不過省建設廳委派的技術員的勘估報告否定了這一提議。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此處工事太多：「臨藍兩縣均為省垣內屏，除國防工事外又有外圍工事。

113 〈華清池上的怪標語〉，《攝影畫報》，卷 9 號 45（1933 年 12 月），頁 4-5。儘管這些口號可能被解釋為 1931 年日本入侵中國後對於普通洗浴者的一種政治宣傳，不過，這些口號也可能是來自楊虎城政府的行政命令，針對前來洗浴的士兵的抗日宣傳。

114 王栻，〈長安遊記之一：華清池〉，《市街》，期 3，頁 15-16。

115 楊維泉，〈國民黨戰幹四團概要〉，《西安文史資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輯 7，頁 89。

每至山腰即戰壕橫纏，凡有險要山頭又築碉堡。」此外亦有治安問題：「山中土匪出沒無常，劫財傷身事件時有所聞，刻下該山尚有李文善兄弟率領二百餘人盤踞山中，搶劫民物，騷擾閭里。」[116]可見驪山一直是國軍以及各種地方武裝組織頻繁出沒之所。不僅有土匪不時下山劫掠，前去驪山洗澡的國軍士兵也常上山砍伐樹木做爲薪材，驪山的護林員和本地居民也不斷受到這些士兵的騷擾。[117]

中旅一直到 1949 年前都繼續努力在戰事中保持華清池的經營。但由於戰爭期間的通貨膨脹，在整體國民經濟癱瘓的情況下，中旅所經營的華清池自 1940 年起就再未盈利。而由軍人士兵和本地居民免費使用的民眾浴池和婦女浴池，也更加無人管理。公共浴池清潔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兩處免費浴池「時常池底積垢，穢汙氣滿布，因有廁所溝地便溺，使臨潼得天獨厚之天然浴池，不但不能清潔，反而成一傳染疾病場所」。[118]而臨潼縣政府似乎無力維持或促進此項公共衛生事業，最終戰時主要的管理工作由駐紮本地的軍隊來承擔，例如 1948 年駐紮在臨潼的 29 軍就承擔了驪山溫泉免費浴池的重建工作。[119]最終，在 1949 年 10 月，華清池被中國共產黨西北軍政委員會接管。[120]

六、結　語

近代中國溫泉療養、公共洗浴與景觀重建，是在長時段本土使用軌跡與近代全球礦泉療養理念興起的背景下交錯展開。近代中國溫泉開發與利用基於帝制期間的地方官員與文人菁英所描繪和建構出的溫泉景觀，以及在地社群日常

116 〈設立驪山畜牧場〉（1942 年 5 月），頁 13-20，《建設廳檔案》，陝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 72-8-138。這份報告是由建設廳所派的技術員喬學明所撰寫。

117 〈臨潼縣政府關於驪山果樹園藝計劃報告及本廳訓令〉（1941 年 9 月），頁 1-23，《建設廳檔案》，陝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 72-5-57。

118 臨潼縣政府，〈修理女浴池〉（1946 年 7 月），頁 66-72，臨潼縣檔案館藏，館藏號 174-2724。

119 〈本廳關於臨潼縣電派工程師指導修理浴池的訓令〉（1948 年 6 月），頁 1-3，《建設廳檔案》，陝西省檔案館藏，館藏號 72-3-1251。

120 華清池管理處編，《華清池志》，頁 38。

生活中的公共洗浴習俗。而自歐洲興起的風靡全球的近代礦泉療養以及與其相關的旅遊休閒沐浴潮流，亦成為重要的參照對象。在全球與本土的互動下，本文以西安城郊華清池為個案，討論菁英話語與日常大眾使用之間的城市史、社會生活史、公共醫療史、與城郊景觀環境史之間的交融面向。

在二十世紀初開發西北和建設西京的背景下，不同的軍方、府方、與資方之間都力圖主導對驪山華清池進一步的開發與利用。陝西地區的西北軍與之後的陝西省政府先後在此重修溫泉浴池，最終由與國民黨政府在全國都有著密切合作的中旅獲得華清池溫泉的改建與專營權。正如在北京和南京的北、南湯山溫泉被先後改建成為迎合都市菁英階層的現代溫泉度假所一樣，帝制時期華清池中「官池」與「環園」洗浴與休閒空間也在此時被中旅重建和經營，從而繼續成為專供上等階層以及中上階層可購票消費的旅遊休閒產品。華清池之外的公共浴池則由地方駐軍與政府間斷負責管理維護，免費或低價提供一般平民和普通士兵，一如帝制時期的「民池」。驪山溫泉在前現代長期存在的官方菁英與一般大眾既隔離又共存的洗浴空間，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上半葉。

在華清池內，這種商業化的溫泉療養與洗浴服務不全然是簡單地由西方引入，而是延續了前現代專門服務來往官員的驛站和商業公共澡堂的經營傳統。現代的轉型更多體現在更新的現代洗浴與旅館住宿設施。1936 年西安事變之後，華清溫泉則進一步被重新建構為國家意識形態化的景觀。但由政府機構與外來菁英所主導的國家想像與民族建構，很大程度上只是浮於表面的文字。由於華清池自身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使得華清池的盛唐氣象以及貴妃出浴的情色意象一直佔據著人們的想像，而蔣介石被俘的戲劇性場景以及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也吸引了更多前來此地獵奇的遊客。

在近代轉型期間一直被主流敘事所忽略的層面，則是當地以及周邊村鎮居民對華清池之外的免費溫泉洗浴的日常使用、「洗病」風俗與民間崇拜。實際上，自帝制時代在地居民就從未缺席對溫泉的使用和開發。在近代溫泉度假所重建的過程中，過去在地居民公共使用的空間和祭祀場所得以有限保留，並一

度成為由民國政府所倡導的新生活方式和公共衛生教育中心。此外，駐紮本地的各種武裝部隊中的普通士兵也在此時成為這些免費浴池的主要使用者，不同時期的地方武裝部隊也成為重建和維護此處免費浴池的重要機構之一。在各方地方群體參與的華清溫泉重建與日常使用中，與華清池相關的歷史文化元素，讓位於實際生活中的日常使用與在地根植已久的習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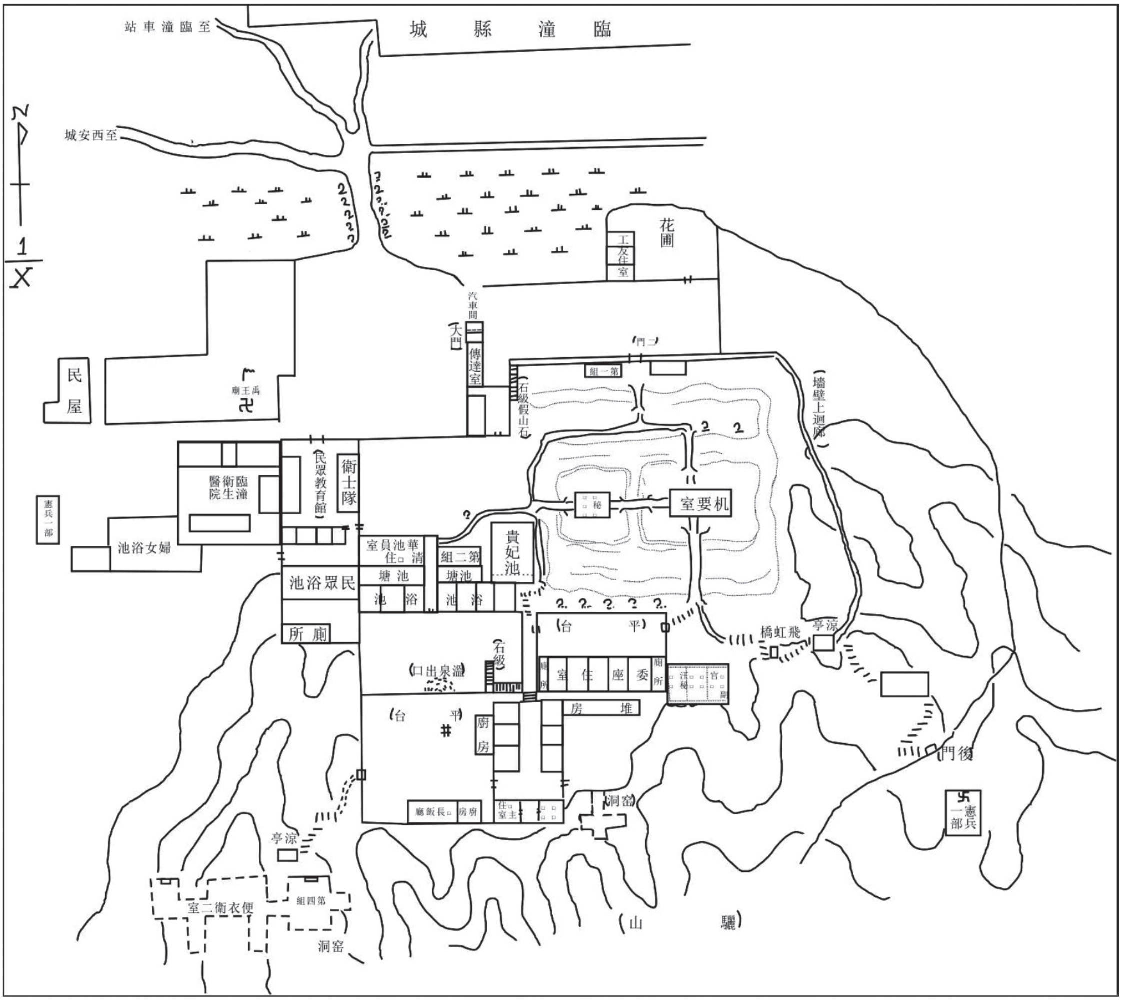
無論是作為中外遊客前往沐浴休閒的華清池，還是在地居民與普通士兵對於公共浴池的日常使用，歐洲現代水療法和浴療法在華清池溫泉始終沒有得到彰顯。即便極力推動建立此項事業的醫師陳炎冰，也並不瞭解他心中所謂的符合歐洲科學標準的溫泉療養治療，不僅在十九世紀晚期以來歐洲的醫學發展脈絡中就引發爭議，更在二十世紀中葉起的歐洲醫療實踐中逐漸退潮。二十世紀下半葉，歐美各地大部分溫泉療養所逐漸轉為康復機構，或以休閒度假與放鬆身心為主的經營模式。因此，中國溫泉的近代開發與利用的研究不能簡單被論述為來自所謂「西方」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考慮在這種現代性轉型過程中，來自特定歷史時刻的間接「西方」知識的某一層面，在中國語境下如何被挪用或想像，並與長時段的前現代在地使用傳統兩相衝撞與結合的過程。

不過，陳炎冰一生追求的溫泉療養事業的心願在 1949 年之後終於達成。驪山華清池經過最新重建後再次向國內外遊客開放，而中國各個避暑勝地或溫泉景觀也開始正式興建溫泉療養院。這一時期溫泉療養院主要作為工人和軍人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一部分，以挪用蘇聯療養院的模式展開。除了華清池開放給遊客使用外，越來越多專為軍隊和重工業工人服務的療養院也在溫泉周邊紛紛建立，諸如鐵道部療養院、中國煤礦工人臨潼療養院、水利部黃河療養院、新疆部隊臨潼療養院、空軍臨潼療養院、蘭州軍區臨潼療養院、長慶油田臨潼療養院等等。這些療養院競相打造深井以獲取更多的溫泉水，為各自專用。臨潼當地也存在地方群眾大量私人鑽孔取得溫泉水，用於經營洗浴、自用洗衣、取暖、清潔等破壞溫泉水源的行為。直到 1990 年代之後，陝西省政府宣布該

地區爲自然和歷史保護區，情況才有所緩和。[121]可見 1949 年之後華清溫泉的歷史，也是本文所關注的近代溫泉開發的延續。透過討論不同人群與溫泉景觀開發與使用的互動過程，我們可以窺見近代中國的私人身體在公共空間的感官享受與治療、城市規劃與自然環境改造之間相互聯動發展的歷史過程。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不同人群採取不同策略對溫泉這類自然資源加以開發和使用，在各種形式的重建與維護之間，一直延續和轉變至今。

121 華清池管理處編，《華清池志》，頁 132-142。

附圖 1　華清池形勢要圖（1936 年 12 月）



資料來源：國史館審編處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三）剿共與西安事變》（臺北：國史館，2002），頁 367；此圖據原圖描繪，各處文字說明中凡帶□之處，皆爲無法識讀的字樣。現於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可以找到原圖，參見：「西安華清池附近形勢要圖」，〈革命文獻－西安事變〉，《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20200-00031-069。

附圖 2　楊貴妃（太真）出浴像

資料來源：《時事新報》，1933 年 2 月 26 日，第 5 張第 1 版。

附圖 3　平民免費可入浴

資料來源：莊學本，〈西遊記第三集：從西京到青海〉，《良友》，期 117，頁 27。

附圖 4　鄉婦於華清池中洗衣

資料來源：〈陝西臨潼華清池中之鄉婦洗衣．艇公攝贈〉，《玫瑰畫報》，期 95（1936 年 9 月 18 日），第 6 版。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陝西省檔案館藏檔案

《林務局檔案》

〈有關驪山造林、驪山森林計劃書〉（1937 年 7 月），館藏號 94-1-174。

《建設廳檔案》

〈本廳關於臨潼縣電派工程師指導修理浴池的訓令〉（1948 年 6 月），館藏號 72-3-1251。

〈省政府及本廳關於臨潼華清池旅遊工作〉（1940 年 6 月），館藏號 72-2-148。

〈設立驪山畜牧場〉（1942 年 5 月），館藏號 72-8-138。

〈臨潼縣政府關於驪山果樹園藝計劃報告及本廳訓令〉（1941 年 9 月），館藏號 72-5-57。

〈關於據送經辦臨潼華清池管理處 1948 年下期收支決算報告的公函〉（1948 年 3 月），館藏號 72-2-1241。

西安市檔案館藏檔案

西京籌備委員會，〈關於修理臨潼華清池房屋橋樑〉（1930 年 6 月），館藏號 02-01-414。

臨潼縣檔案藏檔案

臨潼縣政府，〈修理女浴池〉（1946 年 7 月），館藏號 174-2724。

國史館藏檔案

〈革命文獻－西安事變〉，《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200-00031-069。

〔東漢〕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唐〕徐堅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南宋〕程大昌撰，黃永年點校，《雍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明〕都穆，《游名山記》，北京：中華書局，1991。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史傳遠纂修，《臨潼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冊 7，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王蔭樵，《西京遊覽指南》，西安：天津大公報西安分館，1936。

西川義方，《溫泉と健康》，東京：南山堂書店，1932。
西川義方，《溫泉須知》，東京：診断と治療社出版部，1937。
西川義方，《溫泉読本》，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38。
西安市檔案局、西安市檔案館編，《籌建西京陪都檔案史料選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
西安市檔案館編，《民國開發西北》，西安：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印刷廠，2003。
宋美齡，《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南京：正中書局，1937。
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省志》，卷 72，〈衛生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
陝西省臨潼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臨潼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國史館審編處編，《蔣中正總統文物：革命文獻（三）剿共與西安事變》，臺北：國史館，2002。
陳光垚，《西京之現況》，上海：西京籌備委員會，1933。
陳炎冰，《中國溫泉考》，上海：中華書局，1939。
陳炎冰，《溫泉與醫療》，上海：中華書局，1940。
華清池管理處編，《華清池志》，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2。
滬友會編，楊華等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蔣介石，《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南京：正中書局，1937。
藤浪剛一，《東西沐浴史話》，京都：人文書院，1931。
藤浪剛一，《溫泉知識》，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38。
嚴偉編纂，《南湯山志》，南京：南湯山陶廬，1937。
Osann, Emil. *Physikalisch-medicinische Darstellung der bekannten Heilquellen der vorzeüglichsten Länder Europa's, II.* Berlin: Ferdinand Dümmler, 1832.
Osann, Emil. *Physikalisch-medicinische Darstellung der bekannten Heilquellen der vorzeüglichsten Länder Europa's, I.* Berlin: Ferdinand Dümmler, 1839.
von Salzmann, Erich. *Im Sattel Durch Zentralasien: 6000 Kilometer in 176 Tagen.*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908.

二、報刊雜誌

《小說月報》（上海），1914。
《中華醫學雜誌》（上海），1918。
《今日畫報》（南京），1948。
《市街》（浙江），1936。
《地理雜誌》（南京），1930。
《自由中國》（漢口），1941。
《西北論衡》（北平），1937。
《西京日報》（西安），1933-1937。
《良友》（上海），1933、1936。

《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上海），1936。
《協和報》（上海），1913。
《武進月報》（武進），1918。
《玫瑰畫報》（天津），1936。
《旅光》（上海），1940。
《旅行雜誌》（上海），1933、1944。
《時事新報》，1933。
《海光》（重慶），1946。
《茶話》（上海），1946。
《陝農月報》（西安），1941。
《教與學》（南京），1936。
《責善》（成都），1941。
《善導報》（松江），1915。
《新中國月報》（南京），1946。
《新中華》（上海），1936。
《新社會》（上海），1934。
《新陝西月刊》（西安），1931。
《新醫藥刊》（上海），1935。
《會報》（上海），1928。
《餘興》（上海），1917。
《興華》（上海），1936、1937。
《攝影畫報》（上海），1933。

三、專著

史紅帥，《明清時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史紅帥，《近代西方人視野中的西安城鄉景觀研究（1840-1949）》，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史紅帥，《近代西方人在西安的活動及其影響研究（1840-1949）》，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何小芊，《中國溫泉旅遊的歷史地理研究》，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2013。
宋玲平，《清代湯泉行宮》，北京：故宮出版社，2023。
沈睿文，《安祿山服散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周慧梅，《近代民眾教育館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陳三井，《旅歐教育運動：民初融合世界學術的理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
劉三民、裴靖瑜、張青艷主編，《人文臨潼（風景名勝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Adams, Jane M. *Healing with Water: English Spas and the Water Cure, 1840-196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Anderson, Susan C., and Bruce H. Tabb, eds. *Water, Leisure and Culture: Europ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2.

Berezkin, Rostislav. *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Bradley, Ian. *Water Music: Making Music in the Spas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Jennings, Eric T. *Curing the Colonizers: Hydrotherapy, Climatology, and French Colonial Spas*. Duk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Lei, Sean Hsiang-lin.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Leung, Angela Ki-Che,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Mo, Yajun. *Touring China: A History of Travel Culture,* 1912-194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Rockel, Ian. *Taking the Waters: Early Spas in New Zealand*. Wellington: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Publications, 1986.

Rogaski, Ruth.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Teiser, Stephen F.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Walsh, Casey. *Virtuous Waters: Mineral Springs, Bathing, and Infrastructure in Mexico.*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Wood, Karl E. *Health and Hazard: Spa Culture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四、論文及專文

吳善家，〈陝西省民眾教育館研究：以西安和長安地區為中心〉，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

邱仲麟，〈民國時期北京的女浴所〉，《北京史學》，2022 年秋季刊，頁 3-55。

胡鑫、靳瀟颯，〈北京第一家女浴所創建始末〉，《北京檔案》，2020 年第 4 期，頁 46-49。

唐華清宮考古隊，〈唐華清宮湯池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文物》，1990 年第 5 期，頁 10-20。

唐華清宮考古隊，〈唐華清宮湯池遺址第二期發掘簡報〉，《文物》，1991 年第 9 期，頁 1-14。

張鐵寧，〈唐華清宮湯池遺址建築復原〉，《文物》，1995 年第 11 期，頁 61-71。

陳建華，〈楊貴妃「出浴」與摩登上海〉，《澎湃新聞》，2018 年 9 月 29 日，https://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479481&from=yidian （2023 年 7 月 27 日檢索）。

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溫泉〉，《〈水經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頁 78-87。

游欣婷，《明清澡堂的發展與社會互動》，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楊維泉，〈國民黨戰幹四團概要〉，《西安文史資料》，輯 7，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85-92。

葛承雍，〈唐華清宮沐浴湯池建築考述〉，收入榮新江主編，《唐研究》，卷 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437-454。

趙康民，〈唐華清宮調查記〉，《考古與文物》，1983 年第 1 期，頁 32-38。

潘淑華，〈城市、避暑與海濱休旅：晚清至 1930 年代的北戴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5，2017 年 3 月，頁 39-75。

龔勝生，〈中國宋代以前礦泉的地理分布及其開發利用〉，《自然科學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頁 343-352。

Barrento, António Eduardo Hawthorne. "Going Modern: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t the Seaside and Hill Resort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52:4 (2018), pp. 1089-1133.

Condrau, Flurin. "'Who Is the Captain of All These Men of Death':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Tuberculosis Sanatorium in Postwar German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2:2 (2001), pp. 243-262.

Eddy, Matthew D. "The Sparking Nectar of Spas; or, Mineral Water as a Medically Commodifiable Material in the Province, 1770-1805." In Ursula Klein and Emma Spary, eds., *Materials and Expertis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etween Market and Labora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198-226.

Frank, Alison F. "The Air Cure Town: Commodifying Mountain Air in Alpine Central Europe."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5:2 (2012), pp. 185-207.

Goldman, Armond S. et al. "What Was the Cause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s Paralytic Illness?." *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 11:4 (2003), pp. 232-240.

Huang, Fei. "Bathing through Time and Landscape: Everyday Encounters and Reconstructions at Huaqing Hot Springs (1000-1900)." *T'oung Pao*, 109:3/4 (2023), pp. 1-44.

Huang, Fei. "Knowledge Building on Nature and Body: Hot Springs in Premodern Chinese Sources. An Overview."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vol. 57 (2023), pp. 47-80.

Huang, Fei. "Spa Treatment, Geothermal Resources, and Mass Consumption: Rediscovering the Hot Springs in Mod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ast Asia, Frankfurt, Germany, 21-25th August 2023, https://www.uni–frankfurt.de/141379062.pdf.

Lempa, Heikki. “The Spa: Emo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Classes in Nineteenth-Century Pyrmont.”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5:1 (2002), pp. 37-73.

Nelson, Marie C., and Staffan Förhammar. “Swedish Seaside Sanatori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 2:2 (2009), pp. 249-266.

Palmer, Richard. “‘In This Our Lightye and Learned Tyme’: Italian Baths in the Era of the Renaissance.” *Medical History*, 34:10 (1990), pp. 14-22.

Park, Katharine. “Natural Particulars: Medical Epistemology, Practice, and the Literature of Healing Springs.” In Anthony Grafton and Nancy Siraisi, eds., *Natural Particulars: Nature and the Disciplines in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pp. 347-368.

Rosenbaum, Adam T. “Grounded Modernity in the Bavarian Alps: The Reichenhall Spa Cultur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1 (2014), pp. 30-53.

Schafer, Edward H. “The Development of Bathing Custom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Floriate Clear Pala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6:2 (1956), pp. 57-82.

Sirén, Osvald. “The Journey to Sianfu.” *The Theosophical Path*, 24:6 (1923), pp. 578-593.

Spencer, J. E. and W. L. Thomas. “The Hill Stations and Summer Resorts of the Orient.”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38:4 (1948), pp. 637-651.

Tai, Jeremy. “Opening Up the Northwest: Reimagining Xi’a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Frontier.”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2015.

Topp, Leslie. “An Architecture for Modern Nerves: Josef Hoffmann’s Purkersdorf Sanatorium.”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6:4 (1997), pp. 414-437.

van Tubergen, Astrid, and Sjef van der Linden. “A Brief History of Spa Therapy.” *Ann Rheum Dis*, 61:3 (2002), pp. 273-275.

Will, Pierre-Etienne. “Xi’an, 1900-1940: From Isolated Backwater to Resistance Center.” In Billy K. L. So and Madeleine Zelin, eds., *New Narratives of Urban Space in Republican Chinese Cities: Emerging Social, Legal, and Governance Orders*. Leiden: Brill, 2013, pp. 223-274.

Spa Treatment, Public Bathing and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Huaqing Hot Springs at Mount Li

Fei Huang*

Abstract

In contrast with the abundant and cohere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hot or mineral springs in Europe, America, and their colonial regions, research on Chinese hot springs, both in the premodern and modern period, has remained largely neglected.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hot spring resorts, Huaqing Hot Springs 華清池, and its surrounding landscape in the suburbs of Xi'an, which was recycled, selectively reused, and negotiated b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from the t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After the threat of Japanese invasion proved inevitable in 1932, Xi'an was selected as the auxiliary capital and renamed the "Western Capital" by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government, which greatly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city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urban landscape areas,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remains, and promotion of public health and tourism, among other important aspects. Meanwhile, the modern concept of commercialized spa treatment, sanatoria, and public bathhouses became fashionable for the emerging upper class and urban elite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other eastern coastal c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uaqing Palace 華清宮, Mount Li, and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were thus rebuilt as a landscape maintenance district and hot spring resort for the upper class. But it was also reconstructed with public bathhouses and a public park for the common visitors by new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namely travel agencies, and was represented as an ideological landscape within official narratives. Despite the changes, however, the previous usage of the hot springs and the local bathing customs from late imperial times were never eradicated.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Huaqing Hot Springs is closely related to bo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and the personal sensory enjoy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Taking Huaqing Hot Springs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diverse perceptions and activities from various social actors are involved in the acknowledgement, control, management, and consump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hot springs. Moreover, it furth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behi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ot spring spa treatment, public bathing, and suburban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daily life within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that was taking place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hot springs, spa resort, public bathing, urban planning of the Western Capital, suburban landscape

*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Germany